

#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 出席者：

總督衛奕信爵士，K.C.M.G (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翟克誠議員，O.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政務司廖本懷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O.B.E., J.P.

張人龍議員，O.B.E., J.P.

譚惠珠議員，C.B.E., J.P.

陳英麟議員，J.P.

鄭漢鈞議員，J.P.

鍾沛林議員，J.P.

何世柱議員，M.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潘志輝議員，J.P.

潘宗光議員，J.P.

司徒華議員

戴展華議員，J.P.

譚王葛鳴議員，J.P.

譚耀宗議員

謝志偉議員，O.B.E., J.P.

黃宏發議員，J.P.

劉皇發議員，M.B.E., J.P.

地政工務司班禮士議員，C.B.E., J.P.

教育統籌司布立之議員，O.B.E., J.P.

運輸司梁文建議員，J.P.

何承天議員，J.P.

保安司班乃信議員，J.P.

行政司曹廣榮議員，C.P.M., J.P.

衛生福利司周德熙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鄭明訓議員

鄭德健議員，J.P.

張子江議員，J.P.

方黃吉雯議員，J.P.

林貝聿嘉議員，M.B.E., J.P.

林偉強議員，J.P.

劉健儀議員

劉華森議員，J.P.

梁煒彤議員，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薛浩然議員

蘇周艷屏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J.P.

**缺席者：**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葉文慶議員，O.B.E., J.P.

范徐麗泰議員，O.B.E., J.P.

潘永祥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J.P.

周美德議員

梁智鴻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羅錦生先生

## 條例草案二讀

### 一九八九年撥款條例草案

#### 恢復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提出二讀的辯論

張鑑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一九八九年至九〇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全面周詳，充分發揮了平衡作用，幾近完美無瑕，我們應向全體政府人員，特別是向財政司衷心致賀。本局不少議員可能略有微言，甚至批評政府的財政措施過於審慎，未能為個別議員最關注的服務範疇提供適當撥款。由於本港政府過去兩年來累積了大量盈餘，故當局似乎更難以抗拒增加開支的要求。然而，在制訂有關公共財政的管理策略，以應付更長遠的需要時，實不應過分受短期內財政盈餘的多寡所影響。因此，財政司必須就其所述的三大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取得均衡，這點至為重要。概括而言，主席先生，我完全支持當局所採取的財政策略。

儘管如此，我想提出一項建議，希望當局在擬訂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能予以慎重考慮。此外，我亦想提出一些觀察所得，它們對本港日後的經濟增長或有效率地管理本港公共財政方面，當有一定的影響。

首先，我想談談我的建議。中等入息階層人士認為，他們的需求、期望及對社會所作的貢獻，與透過稅項寬減及其他方面所得的利益並不平衡，政府必須確認存有這種不平衡的情況。范徐麗泰議員就此問題所作的分析，精簡扼要、條理明晰，甚具說服力，我衷心支持她和本局其他議員的呼籲，請政府從速積極處理此問題。為顧慮到政府可能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例如經費何來，應減少那項計劃的開支等等，我謹在此略抒管見，建議當局日後擬訂預算案時，毋需考慮進一步降低個人的標準稅率及公司利得稅。我認為本港的高入息階層和公司對目前的低稅率應已心滿意足。當局日後若因有盈餘而擬進一步寬減稅項，則應首先照顧本港的中等收入階層。畢竟，把利得稅降低 0.5% 或甚至 1%，對個別需繳納稅款公司的成敗，實在無關痛癢。但另一方面，倘把降低 0.5% 利得稅的整項利益（以全年計約為 6 億 9,500 萬港元）用以惠及每年入息介乎 10 萬至 50 萬元的納稅人，則會有近 30 萬人真正得益。基於上述理由，我懇請當局在制訂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財政策略時，審慎考慮我的建議，並予以採納。

現在轉談關乎本港經濟日後健全發展的各項問題。首先，我極端關注本年度經常公共開支的急劇增長。事實上，這也是預算案中最令人憂慮的一環。在過去，本港經濟有卓越的表現，若要歷史重演，可能並非易事。倘本港公營部門的經常開支項目繼續佔用本港經濟的大部分資源，則倘若經濟情況一旦逆轉，我們或會面對非常棘手的問題。我只希望這種短暫的急速增長不會演變為一種趨勢，倘發現不必要的開支，財政司及財政科人員必須在本年內設法把它刪除。無論如何，我認為財政司應作出保證，答允先行遏止該等急速的增幅，繼而在未來兩至三年內，以本港生產總值的中期趨勢增長率作為公營部門支出進一步增長的上限。

其次，我很高興知道，財政司已察覺到有需要嚴密注視一頭名為「通貨膨脹」的怪物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我們不但應監察本港的通脹發展情況，還應在其有跡象會惡化至無法控制的地步前，加以迎頭痛擊。然而，請讓我就為遏止通脹而可能採取的辦法進一言，部分社會人士認為，倘撤銷港元聯繫匯率，便可輕易解決通脹引起的問題。曾有人聲稱，由於港元與幣值疲弱的美元掛鈎

，若取銷聯繫匯率，大部分困難便可迎刃而解。該項論據實在過於簡化有關問題，未有顧及本港需要長期的安定環境。我們必須緊記，實施聯繫匯率，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本港的穩定，而非為經濟理由。因此，我必須在此籲請政府切勿輕易改變聯繫匯率。

第三個關乎本港經濟日後發展的問題，是長期缺乏人力資源，可能對本港所產生不良的影響。主席先生，我不採用「勞工短缺」一詞，因為我認為人們在這問題上已過於感情用事，而不是以冷靜的頭腦作理性的分析。

這個問題在 18 個月前首次提出時，我公開反對部分人士呼籲輸入外地勞工，因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先對勞工短缺問題作周詳的研究，才可進行評估，以確定對策。我曾促請政府經濟顧問作出一項總體經濟研究，以探討本港若長期欠缺勞工，對日後的經濟增長會有何影響，可惜當局對我的建議置若罔聞。因此，除了一般理論性聲明和概括主張外，並無證據顯示政府當局曾認真設法對此事作詳盡的分析。舉例來說，政府一再申辯，勞工短缺問題可藉採用自動化設備去解決。誠然，這種說法肯定不會出錯，但政府是否知道，勞工短缺是公私營機構、大機構或私人經營的家庭式商店，均面對的問題，而非單只製造業受到影響。我們不能採取鴉片政策，繼續否認本港整體上缺乏維持現行經濟暢順運作所需的人力資源。就採用自動化機械設備來說，政府可知道本港經濟愈來愈倚重服務行業的發展，而良好的服務質素和效率，乃是一個以服務為主的經濟體系的成功要素，至於服務的質素是否良好，則與服務人員與職位的比例有直接關係。我們當然不會認為酒店及飲食業等服務行業亦可應用機械而令客人感到同樣滿意。主席先生，為本港未來的穩定繁榮着想，我祈求香港能夠經常保持勞動人口全面就業或接近全面就業的情況。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具備所需的遠見和勇氣，去應付任何可能窒礙本港將來的經濟增長和長期維持經濟穩健的問題。我深信本港工商界定會一呼百應，表明我們並非如人們所指稱，只為了本身的經濟利益而提出輸入外地勞工的建議。與其他社會人士一樣，我們都是有良知的人。畢竟，我們均識大體，知道有責任為社會效勞和作出貢獻，而呼籲有關方面研究輸入勞工問題，並非要剝削本港勞動人口改善生活質素或工資的機會；我們絕對樂意進行會談，以討論可行及為雙方接納的方案；我們並非要求取得全面的權力，以達斂財的目的，而是希望我們的建議獲得適當的考慮，卻不會帶來不必要的含沙射影和意氣之爭。政府必須讓各有關方面見到，它是以理智和分析的態度去處理這問題。因此，政府必須率先發起對話。但政府對不斷要求其成立委員會以深入研究該等問題的呼籲，充耳不聞。主席先生，除非世界經濟萎縮，否則，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將會在明年甚或更長期間內困擾本港。如果我們不加以處理及設法解決，便冒上日後經濟增長受到窒礙的重大風險，而這肯定不是我們所願見的情況。

第四，我想談談政府需要認真檢討目前本港為預備將來所需而在研究及發展工作方面所採的投資態度。主席先生，在香港這個重視短期利益的社會裏，若表示有意把數以百萬元計的款項花在研究及發展之類不着邊際及不易理解的概念上，將會使人瞠目結舌，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無可否認，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倘我們希望日後有機會與其他地區公平競爭，藉以取得一定的經濟增長，則需面對目前日新月異的科技業已及繼續會加諸本港經濟結構的壓力，因應變化，與時並進。事實上，一日千里的科技發展對本港日後能否保持現有的地位，亦有重大影響。我們必須在教育及專上教育方面繼續作出承擔和投資，始能趕上其他地區。可惜，現時投資專上教育若要取得成果，則同時需在研究及發展方面作出相若的，或至少是合理的投資。投資發展專上教育與進行研究及發展工作，實在是相輔相成的。倘刻意抑制或妨礙研究及發展的工作，則專上院校所取得的成就及卓越的表現，肯定會黯然無光。因此，我想向政府呼籲，現在應開始籌備對本港的研究及發展工作進行詳細的檢討或研究，例如，政府的參與應達那個程度，我們可採取或需採取何種措施，以集合公營及私營部門的資源，應付這個對本港未來影響深遠的問題。主席先生

，在處理研究及發展的問題上，本港較其他鄰近國家最少落後 10 年。我們必須急起直追，不應亦不容把這個問題一再拖延。

主席先生，最後我得讚揚政府當局致力改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的效率及成效。當局現正考慮一項計劃，把更多的理財權力授予不同部門的首長，以便他們能更有效地管理本身所獲得的資源。這個原則是完全正確的，但我必須指出，若要達到預期的效果，實際上或許相當困難。主席先生，當我們審視各部門可供運用的資源總額時，便可能會發覺大部分經費是撥作員工方面的支出。以大多數部門來說，員工薪俸約佔開支預算的七成至八成。有關員工方面的事項，特別是薪酬的水平以及聘請與解雇員工的權力，往往並非由控制撥款人員所管制。舉例來說，控制撥款人員即使發覺 10 名文員為冗員，亦無權解雇他們，也不可因應市場的趨勢，調高或調低員工的薪酬。再者，控制撥款人員一般缺乏有效地管理鉅額金錢的經驗。因此，倘遽然給予他們過多的財政自主權，則初期可能會導致他們任意揮霍，而非節約儉用。過去我們在嘗試把開設職位的責任授予各有關部門時，確曾遇到上述情況。主席先生，如我沒有記錯，各部門在首年即增設約 20% 的職位。因此，我們就這事項作出最後評估時，無論如何均須顧及上述情況，才是明智的做法。

主席先生，財政司曾特別請本局議員就本港開徵某種形式的銷售稅的建議提出意見。我很抱歉無法就此事提出多大意見，但我可向財政司承諾，我定會以開明的態度研究建議的細則。我認爲我們不應盲目反對開徵銷售稅。任何一個富責任感的政府，爲未雨綢繆而提出討論若干事項，並加以辯論，是絕對正確的做法，而我相信香港政府是有責任感的。我們不應窒礙政府尋求社會人士就某事進行討論及辯論的熱誠，正如政府不應未經研究便壓抑社會人士對某事提出意見及建議一般。儘管如此，社會人士確實尚未充分了解開徵銷售稅的問題。我們可能對開徵銷售稅的影響各有不同的見解，倘政府當局不就開徵銷售稅的計劃提供一些較具體的方案，則我們極難就此事進行理智的辯論。財政司先生，現在實際上是由你採取行動的時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樂意支持當前動議。

何世柱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建議一九八九至九〇財政年度預算案，一如以往地保持了穩健實際的作風，在預期有龐大盈餘並預測未來數年經濟繼續增長的情況下，提出對各項稅率作出寬減，使本港各階層人士都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但是，在個人免稅額方面提高不到 10%，僅能彌補通脹率，實質上得益不大。

另外我想借此機會代接受公共援助的人士說幾句話。大家知道，接受公共援助的人士都是接近赤貧，他們很難拿着一筆小數目的錢，既要應付基本的生活，又要應付急劇上升的通脹，而政府每次調整，一是調整不足，一是沒有估計到通貨膨脹的速度，一是最低限度一年後才調整。我始終覺得對這些不幸的人士，他們過去對香港有很大貢獻，在一個比較豐裕的時候，我們應對他們公平些，令到他們不致捉襟見肘。

我在上一年度預算案辯論時，曾經要求政府採取直接措施，以鼓勵廠商更新設備，採用先進的科技。我很高興見到，在新預算案中已有了回應，設置符合條件的機器設備的最初免稅額，由 55% 提高至 60%，雖然這個增幅並不算大，但總算對廠商有鼓勵作用，亦使廠商得益。

正如預算案提到的，制訂預算的依據首先是基於經濟的表現。本港連續兩年生產總值都有兩位數字的增長，並且安然渡過一九八七年十月的股市風暴。八八年雖然放緩，增長亦達 7.5%，

對外貿易亦有卓越表現；但是，由於本港經濟已高度運作，各類資源及勞工市場均呈現緊張，生產成本上漲，與亞洲鄰近地區的競爭日益激烈。政府面對本港經濟轉型期，需要認真研究長遠策略，以保證本港經濟能繼續繁榮。目前本港各行各業平均普遍出現人手短缺的問題。為此，已有不少廠家遷入內地，以紓緩人力的不足，據了解廣東省已有約四百萬勞工間接或直接為本港廠家服務，如此重大的轉變對本港經濟長遠發展可能產生影響，此影響委實不容忽視。

我極為同意財政司提出，要讓僱員分享經濟繁榮成果的觀點，然而，如果繼續坐視勞力短缺問題，香港經濟必然受到影響。簡單地說，如果社會繁榮受到損害的話，又怎樣來分享繁榮的成果呢？因此，我促請政府在保障本港勞力權益和市民福利的前提下，是應該考慮放寬輸入勞工的限制。

關於銷售稅，在預算案中又再次提及，可以看出政府對於擴大該項稅收的意圖是比較明顯的。我在去年的預算案辯論中，已陳述了不宜擴大間接稅的理由。現在無意再一般地談論徵收銷售稅的利與弊。但是從本港的實際去衡量，我想必須說一說，由於本港已有龐大的財政盈餘，至一九九〇年三月底，更會增至 710 億元左右，本港經濟預測在短期內並無惡化跡象。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的生產總值據保守估計仍然可達 6%。因此，我認為應該維持本港稅制的現狀，而避免使之複雜化。雖然，預算案中提到直接稅在全部稅收中佔的比重已達 65%，而且趨勢是逐漸增加，擴大銷售稅範圍可使政府稅收比較穩定。但是，似乎忽略了香港目前正處於過渡時期，距離一九九七年不過短短八年，我認為將徵收銷售稅的主動權留給將來的香港特區政府，而現在是致力於對已有龐大盈餘的儲備金加以妥善運用，對於本港的社會經濟，將會得益更大。而事實上，今後我們面對的軍費負擔是會逐年免減以及到了九七年後，界限街以北的土地是會徵收地稅來作地租的，而至於由幾年前開始儲下來的賣地收入亦可幫助我們解決一些龐大開支方面的困難，所以我覺得，到那時，政府的財政應該是不需太大擔心的。我們看看日本於今年四月一日起開始徵收銷售稅時，受到社會上的普遍反對，這個事實值得借鑑。

主席先生，我個人認為，總結來說，新的財政預算案是一個穩健的預算案，是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的，但美中不足的，就是對前景的預測在表示樂觀的同時，又似乎有些信心不足，這些矛盾的心情，主要表現在積極準備擴大間接稅網，以預先佈備一個增加收入的步驟，作為平衡擴大開支的手段。誠然，政府要面對龐大的開支，譬如機場的擴建及新建、貨櫃碼頭的擴展、第三條海底隧道的興建及改善道路交通設施等等。但這些措施是為本港的繁榮而作出的，受到市民的歡迎及支持。政府應該用積極進取的態度，努力爭取成績，毋須為保持穩健而多所顧慮，政策能夠符合人心的趨向，就是成功的關鍵所在。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彭震海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向本局提出的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財政預算，政府收入有八百餘億元，支出 700 億元，預計再會有 115 億元的盈餘。至於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 6%；通貨膨脹估計為 8.5%。

我同意財政司預留鉅額盈餘用作未來發展基金，確有必要。但在連續幾年的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政府每年積儲大量盈餘的情況下，財政司的預算不僅仍然保守，而且沒有體現到閣下去年十

月《施政報告》中所強調的「讓社會整體分享經濟成果」的原則。非常明顯地勞工福利與社會福利，依然被忽視，與經濟增長不成比例。由於社會資源作出不適當、不公平的分配，貧富差距更為顯著加劇，這會對社會和諧安定種下嚴重隱憂。

「免稅額」設立的原意，是使低收入者不必納入稅網，令他們可以維持基本生活；但多年來，免稅額並沒有隨着經濟增長以及通貨膨脹，而作出可以改善中下層人士生活質素的提高。回顧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個人免稅額當日是 10,000 元，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增至 39,000 元，大致可以勉強地抵銷通貨膨脹，亦即是他們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他們不能分享社會經濟增長帶來生活質素的改進，這是絕不公平的。

主席先生，政府正在非常積極地研究擴大稅源並探討徵收「銷售稅」的可行性。務使所有市民，甚至包括不能自助者和依賴公共援助的墮入稅網。如果有一天真的實施，可以說更甚於「苛稅猛如虎」，因為銷售稅一旦實行，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真真正正達到「一網打盡」的目的。

財政司對待工商界及高收入者作出「錦上添花」的減稅，藉以安撫他們來保持「經濟繁榮」，但對中、下層，尤其勞工階層則不給以「雪中送炭」，我深表不滿。

主席先生，昨日，大家都聽到香港面臨人力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事情是否這樣？在此我不多作舉例。昨天聽到說，香港過去有些立法局的議員，以前都是移民，因此，香港經濟發展一定要依賴移民，我相信此論調不須駁斥，公道自在人心，這問題留待以後詳細討論。

主席先生，我謹以引述去年在財政預算辯論中的一段作為總結：「政府雖然提高免稅額，實質上跟不上近幾年的通貨膨脹。稅收制度理應公平地將社會資源作合理分配，更應該顧及到貧富差距。政府慷慨削減利得稅，對改善勞苦大眾的照顧，顯然不足，我深表遺憾。」

財政司在研究擴大間接稅及徵收銷售稅的可行性，我認為若政府徵收銷售稅，不僅打擊旅遊業，並且將會加重普羅大眾的負擔，對社會、民生影響深遠，後果嚴重，我認為不值得研究。」

主席先生，我簡略陳辭，支持動議。

潘宗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一九八九至九〇財政年度預算案的內容中找出理由祝賀財政司，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這是一份平穩均衡的預算案，處處表露出財政司的審慎和睿智。但在我加入其他議員同事的行列支持動議的同時，我更關注的是預算案顯著地遺漏了的一個環節，我是指政府似乎不願為香港的將來，在科學及科技這個重要環節上，作積極的投資。此外，我亦要指出預算案未能提供足夠的鼓勵，誘導工業界轉向高科技發展，以應迫切的需要；在研究及發展方面的撥款亦見不足；以及似乎未能察覺一點，就是我們若能作出更多有想像力的撥款安排，當可在人力培訓方面取得更多成績，以應付人才外流帶來的影響。

以上就是我準備在今午論述的幾件重要事項。此外，我亦希望提出若干建議，供財政司考慮，以履行其任務，設法「滿足社會的需求，但同時卻不使目前的通貨膨脹加劇，或較長遠來說，不使本港的繁榮受到損害」。



## 科學及科技

主席先生，香港科技委員會成立已有一年，雖然屢次提出請求，至今仍未能在預算草案中獲得撥款，以制訂其本身的每年財政預算，作為籌劃其活動，或展開如舉辦展覽會、會議及教育計劃等一類工作的經費。我特別感到失望，因為我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曾要求當局作出保證，在盡可能範圍內，為使委員會的建議得以落實進行，當局應提供足夠的財政資源。現時在財政出現盈餘的情況下，實在已再無藉口拖延資助這個重要的工作，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投資。

當然，我明白到科學及科技的領域，是需要長時間的努力耕耘，始會開花結果，並不可能立見其利。在這方面付出的努力，通常需要五至十年時間才見成績。正因如此，科學及科技在爭取撥款方面，比較其他公營部門開支預算項目吃虧，因為例如社會服務或保安，或基礎設施發展等項目的需求較為明顯，而且其急需處理的情況亦較為易見。關於這方面，我衷心支持財政司將部份累積盈餘指定用作推行未來 10 至 15 年的各項基礎設施計劃。不過我要理論的一點是，興建新機場或增建另一個貨櫃碼頭的需要固然明顯，但協助香港工業轉向高科技發展、促進本地高等教育院校的研究和發展工作，以及加強社會對科技的認識等，亦同樣的迫切。如果政府眼光短淺，只着重於眼前急務，長遠來說，亞洲地區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準會後來居上而超越本港。我們的工業一旦失去其競爭優勢，則我們在基礎設施發展方面所作的巨額投資，便會化為烏有。

我完全同意李鵬飛議員所說，在財政預算案演辭及預算草案中關於科學及科技方面開支撥款的資料殘缺不全，已近乎可笑的地步。事實上，科學及科技竟然比不上康樂及文化，或廣播及娛樂，甚至在財政預算案演辭印刷本附件 B 附錄的開支分類註解中，也未有提及，未被列為一個開支計劃範圍。我謹此建議，為了社會的長遠利益及為了證明政府對這個關乎香港發展的重要環節作出承擔，財政司應該適當地確定科學及科技屬於一個開支計劃範圍，將現時出現在各個部門開支總目下項有關此方面的零星開支項目，加以合理的歸類。我可以肯定，這個開支計劃範圍與其他的開支計劃範圍不同，並不需要進行財政司認為有益健康的「定期節食」。事實上，這個開支計劃範圍所需要的卻是大量「脂肪」。

誠然，我明白到委員會在去年可能趕不及要求撥款的時限，因為當時尚未有足夠時間鑒定及編製其工作計劃及鑒定該等計劃在財政方面的影響。不過，委員會現已剛好編定了來年的工作計劃，因此，委員會除了從其他來源獲得的 300 萬元撥款以外，肯定仍需要更多撥款。為了使香港科技委員會的工作及概念能夠繼續有所發展，我建議財政司體諒情況，考慮從額外承擔項下的 43 億元中撥款進行下列所需的工作：

1. 增添機電工程署及政府電腦資料處理處的職員人手，以應付委員會引發的與日俱增的工作；
2. 現時供作進行顧問研究工作及提供專業服務的 300 萬元撥款，實在微不足道，故應增撥經費，以補此方面的不足。當然，各項研究及服務必須能提出事實證明確有進行的需要，才可獲得此項補助的撥款。其中一項顧問研究就是有關生物工藝學的研究，此項研究對日後的工業發展具有廣泛的影響；及
3. 資助擬議舉辦的國際工藝交流展覽會；該展覽會的目標是撮合擁有嶄新科技的公司與大企業的科技工程買家，讓雙方有機會接觸，從而使國際認識到香港是一個促進商業科技交流的地區中心。

主席先生，驟耳聽來，這似乎是過份的要求，然而，我剛才所述的計劃卻可使本港獲相當可觀的利益，我深信財政司若具決心，必有辦法滿足以上的需求。我不能不提的是，據我所知，中央政策組在公佈成立後數個月內，已獲得超過 700 萬元的撥款，作為首年的工作經費。

## 工業發展

主席先生，去年我曾大力促請財政司考慮增加資本免稅額，以鼓勵本港工業界人士在新科技方面作出較大的投資，以提高廠房設備及機器的質素。我很高興在本年度已看到快速的回應。但我認為將最初免稅額由 55% 提高至 60%，實在並不足夠。正如財政司指出，各行業在投資方面的額外開支，大多花在入口貨物上，故不應導致通脹壓力。既然如此，為何不將資本免稅額的增幅進一步提高？提高資本免稅額最終所得的回報，對香港整體的利益，將遠超過估計每年在這方面的 1 億 5,000 萬元的稅項損失。對於急需投資而又未能迅速回本的工業來說，這是另一種不可或缺的支持。

談及我的本行，就是本港有需要在研究和發展工作上多用點資源，以培訓和挽留具獨到思想和卓越遠見的人才，帶領本港的工業發展向前邁進。試想想這個自相矛盾的情況。我們自誇擁有 142 億元的預算盈餘，又自稱為亞洲區內經濟領先地區之一，但我們在研究和發展事業的表現則使人感到詫異。例如，政府撥給五間大專院校在一九八八至九一年這三個年度內作為研究工作經費的款額為 1 億 2,000 萬元。但以該等院校每年平均攤分 4,000 萬元計算，每間院校只不過約獲 800 萬元作為每年的研究經費，此數額較美國每位具名望的教授所獲的研究津貼還少。同時亦不及本港生產總值的 0.02%，與亞洲區內其他國家用在研究和發展工作上的開支相比，則更覺可悲，例如：新加坡在這方面的開支為國民生產總值的 6%，台灣為 0.7%，韓國為 1.4%，而日本則為 2.5%。

主席先生，研究及發展工作對於本港工業的整體發展，至為重要。直接進行研究工作可激發創新及企業精神。我們唯一的資源是人才，香港最需要的是頭腦靈活、具有創思、能夠學以致用及適應環境變化的青年人。現時急切需要的是培育一批具備研究經驗的人才，其人數必須足以應付需求，尤其是現在正值面臨人才外流的時候，此方面的需要就更形迫切。我認為阻止人才外流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向充滿幹勁的青年男女顯示香港有能力為他們提供進一步求進取及發展的機會，並透過加強研究及發展設施，給予他們這些機會。只要這些青年男女認定自己是本港科學及科技力量的一份子，可以在專上院校及工業界作出貢獻，便會覺得自己有很大理由應該留在香港。

## 人力培訓

談到這裏，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就是當局需要採取較創新及較靈活的撥款辦法，以應付工業界在人力培訓方面的需求。

政府有一點值得讚揚，就是在過去多年來發展了一套健全及有遠見的教育基本體制，保證可迅速培訓出熟練的工程師及技師，應付工業界不斷改變的需求。不過，香港現時每類工業均受人才外流所影響，而且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堅強的意志，本港各專上院校，不論新舊，均發覺他們所能培訓出來的大學畢業生、文憑及證書持有人，在數量上始終難以趕上需求，因而無法使這個問題獲得解決。我並非要求當局再增設多間專上院校，而是建議政府對已獲確定其學術地位及經國際評審為有足夠學術水平的專上院校，進行仔細研究，看看如何增強此等院校的效用。我敢肯定，藉着較靈活的撥款安排，我們可在短期內培訓出更多適當的熟練人手，應付本港工業界的需求。

一項積極和實際的行動是鼓勵工業界提供更多在職培訓計劃，政府可能會與海外投資者共同為這類計劃提供經費。政府並可在另一方面作出積極貢獻，就是加強教育界與工業界之間的聯繫。我們曾試圖尋求類似台灣或新加坡的科學樂園所一直採用的研究與實踐互相配搭的方法，但徒勞無功。香港何時才會建立自己的科學樂園呢？

唯一令人感到振奮的消息，就是期待已久的擬議科技中心，終於有了具體發展。工業發展委員會的成員剛接獲有關該項建議的顧問報告最後草擬本。正當委員會仍在研究該份報告之際，我想向身為工業發展委員會主席的財政司提出一點，就是倘委員會認為報告所載的建議值得進一步研究，便不應讓撥款事宜因官僚作風而受阻延，以致影響香港首間科技中心的設立。

主席先生，作為結語，我只想借用布政司在上周向外交事務委員會所發表的言論，喚起財政司的注意。我們不應只是空談，而應有所行動，特別是至今仍被忽略的事項，例如科學與科技、研究與發展，只有更有效地撥款在這些事項上，財政司才可望「盡量透過重新調配現有資源，提供符合本港現時及將來所需類別和質素的服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耀宗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由於行政局於四月四日通過放寬輸入外地勞工政策，相信輸入勞工已經成為這次辯論的熱門話題。作為勞工界的其中一位代表，我對有關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輸入勞工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各種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有關決定反映出政府根本未能充份了解輸入勞工帶來的問題。由於反對輸入勞工的論點已廣為人知，我並不打算也不可能在這裡詳細解釋這麼多論點，我只想談談在爭論「勞工短缺」問題的過程中，所看到的一些有趣問題，藉以指出政治對經濟的作用以及一些人對經濟現象的誤會。

其實，「勞工短缺」的爭論已非一朝一夕，自一九八七年起不少人已參與有關討論。可惜，政府對這問題反應緩慢，更給公眾感覺到政府的立場不斷搖擺，使一般人難以明白政府的施政方針，並誘發一些工商界人士提出不恰當的建議，以至反過來對政府形成壓力。

在「勞工短缺」的爭論過程，政府施政顯然未能關注勞苦大眾的應有權益。主席先生，閣下在宣讀本年度政府《施政報告》時，強調社會「需要工人在經濟不景時共渡困難，而在經濟好景則讓他們分享繁榮成果的宗旨」，可是當這些說話仍言猶在耳的時候，政府竟放寬輸入勞工政策，實在令人費解。現時，香港社會缺乏福利保障，又沒有退休保障，勞工界和福利界幾經爭取，仍只能得到有關法例的些微改善。在「勞工短缺」的爭論上，勞工界提出不少有力論點，但政府並未加以注視，相反經過工商界不斷鼓吹輸入勞工，竟然放寬有關政策，實在使人失望。

綜觀近期社會反應以及一些意見調查，社會大部份人士都反對輸入勞工，但現時建制卻未能反映市民意願，主要原因是行政立法兩局缺乏有勞工或基層背景的人士參與，以至社會人士的意願未能得到反映，嚴重削弱了政策的認受性。因此，政府必須增加有勞工及基層背景的人士參與的機會。

近來，工商界強調自由經濟制度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政府必須輸入勞工以維護自由經濟制度。可是細心分析有關問題，除了國際經濟好景外，香港經濟蓬勃發展很大程度得助於中國供應低廉的原料及食品，自由經濟制度的作用實際上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大，而低廉勞動力對經濟發展推動能力正逐漸減弱，長遠來說更對經濟發展不利。因此，自由經濟制度或低廉勞動力都

不能成為倡議輸入勞工的論據，而且我們也難以明白一些人一面要求援助工業，另一面要求維護自由經濟的論據所在。我呼籲政府切實執行過去的輸入勞工政策，以免香港的社會及經濟轉型受到影響。

有關稅制的問題，我在上年度財政預算案已有詳細的論述。在這裡，我希望強調的只是，一個良好的稅制，除了有效、簡單的原則外，公平也是一個必須具備的重要原則，但這常常為政府所忽視。因此我對稅制有以下建議：

- (一) 薪俸個人免稅額的價值應得到合理保障，一定程度跟隨通貨膨脹及收入水平變化而調整；
- (二) 擴闊直接稅率的稅階；
- (三) 夫婦自由選擇分開或合併評稅，若選擇合併評稅，在職妻子免稅額應予保留以至提高；
- (四) 取消開徵銷售稅計劃。

此外，現時本港社會經濟行為趨於短期化，政府作為社會長期利益代表，進行一些協調及干預是有其合理性。在稅制問題上，政府應鼓勵工商業不要僅僅考慮眼前利益，更要顧及長遠的發展，也應鼓勵市民儲蓄。因此我有以下建議：

- (一) 政府不應削減利得稅，相反可增加投資免稅額；
- (二) 公積金或退休金，僱員供款部份應予免稅；

最後我想提出幾點監察公營機構的意見。

在財政預算案內，政府承認公營機構的重要性，財政司說：「以貨幣計算，差不多半數的公共服務全由法定團體或機構提供，縱使如此，政府仍保留全面的財政控制，以及負責制訂方針和目標。」可是現實情況果是如此嗎？尤其是公眾對公營機構，如兩間鐵路公司，有足夠、充分的監察嗎？

所謂公營機構即是以立法形式成立，根據商業原則經營並負責提供重要公共服務的組織或機構。政府除了提供公營機構的部分資金外，還負起制訂有關公共服務的政策和監察公營機構運作的責任。由於這類公營機構提供的服務都與市民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為公營機構提供的皆是公共資源，不應濫用；所以應建立完善的監管機制，保證公營機構能提供滿足市民大眾需要的社會服務，可見，放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如何監管而不是應否監管。可是現存的監察制度有幾個問題。

就以兩間鐵路公司為例，法例賦與港督委任公司董事局成員及自公司發出指引的權力。現時港督亦有委任有關政府官員成為董事局成員，加強政府的監察能力。但是董事局內討論的事務繁多，何者為重要，何者為不重要；究竟官員評價和決定時依據什麼標準？甚或官員如何知道市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由此可見現時缺乏一套明確、清楚的監管公營機構運作的標準會造成不少問題。再加上公營機構都以商業公司形式運作，很多重要的資料和決定都不會向外公布，引用時下的說法，在資訊封閉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決定，「透明度實在很低；市民又如何監察？雖然影響監察制度的因素很多，但我認為現時由港督委任董事制度所帶來的角色衝突才是問題的核心，受港督委任成為董事的政府官員身負兩個相矛盾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公司的成員，有責任根據商業原則

維護公司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政府官員，負有看守公司運作確保公共利益的任務。然而當公司利益與公共利益處於對立時，政府官員如何取捨？即使政府官員堅決站在市民大眾這一邊，作為董事局內的少數，他們最終仍要服從集體的決定。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身為政府官員的董事囿於角色上的衝突及矛盾實在不能有效地監察公營機構的運作，保障市民的利益。

有人認為公營機構應納入有關諮詢委員會的監管範圍內，加強監察。例如有建議謂交通諮詢委員會應負起監管兩間鐵路公司的職能。但交諮會能否負起恆常性監察的繁重工作實在很成疑問。而且交諮會的基本職能是對政府的交通政策提出意見，並不是交通系統的監察者。它應從香港整體的角度，向政府提出政策性的建議。如果交諮會還要擔任監察者的職能會否帶來工作量過重及角色衝突等問題？

又有人認為政府可以透過利潤管制計劃的安排控制公營機構的運作。且不論公營機構能否有條件成為上市公司及現有政府與公營機構之間千絲萬縷的財政關係；社會人士對利潤管制計劃的成效亦存有不少疑問。公司利潤應否有固定資產值掛鈎及利潤以外運作指標的重要性等問題都未有公論。

現存的監察途徑都存在一些問題，那麼理想的監管制度又應該如何？

我認為較理想的做法應是由政府委任一個監管委員會負起下列工作：(1)訂定監管公營機構的運作標準。(2)負責與公營機構訂定年度協議。(3)定期對公營機構的運作作出評估及匯報。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各級議員、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人士，這個委員會根據既定的政策目標和運作標準與公營機構訂定年度協議。參考外國有關經驗，協議可包括幾方面的內容：(1)公營機構的目標（包括商業性和非商業性的）；(2)主要服務及次要服務內容；(3)政府和市民特別關心的政策問題；(4)財政安排；(5)報告制度的安排。

監管委員會與公營機構簽訂年度協議有幾方面的優點，首先監管公營機構的運作標準和年度協議選定了一組與政策目標及服務質素密切相關的經營指標，清楚界定了監察的範圍，內容及標準。不單政府和市民都能夠從而掌握到監察的實質內容而且公營機構亦會避免受到過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預。也就是說，明確的契約關係有助弄清政府、市民及公營機構三者之間的權力和責任。

而且公營機構的運作標準提供了公開、客觀的指標，讓市民有機會知悉監管的內容，參與監察公營機構的運作。具體來說，市民可以通過兩個層面的途徑參與。政府委任的監管委員會制訂出運作標準，公開諮詢社會人士的意見，經充分討論後才作最後決定。其次在每年定期評估公營機構的業績時，監管委員會會主動收集市民對公營機構的意見，從而作出較符合市民意願的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我認為政府在下放行政及管理權力的同時，亦應加強市民對公營機構的監察權；這樣才能保證公營機構能夠提供滿足市民需要的社會服務。

本年度立法局年度伊始，行政司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會議席上說：「為使政府和法定組織在最終政策及財政管制方面的關係能夠合理化，當局已決定進行一連串的檢討，以確保能夠符合若干項大原則。」經過半年時間，究竟政府檢討的結果如何？我認為政府應公開檢討結果，向

市民作出交代。我並且建議各有關政府決策科成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檢討公營機構與政府的關係，儘早提出建議、廣泛徵詢市民意見。政府當局應正視並從速解決這個全港市民關注的問題。

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讓我先向財政司致賀。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清晰明確，極有助議員，尤其是新任議員如我等，作詳細的審閱。財政預算愈來愈着重每名控制撥款人員的工作目標，意味著其責任的承擔，這的確是一項很大的改進。

今天，我將集中談論本港經濟的整體大觀、勞工短缺和基礎設施計劃等問題。

財政司開宗明義地指出有需要滿足社會的需求，但卻不能使通貨膨脹加劇。過去一年多，本局很多議員都極其關注通貨膨脹和勞工短缺的問題，現時這些問題正加倍獲得注視。我們均表示歡迎。

正如財政司所言，工商業仍然是本港經濟的骨幹。一九八八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港產貨品出口貿易首次在該年度被轉口貿易超前。這項發展使推廣本港貿易的策略，甚至是本港日後的製造業、基礎設施等等，產生巨大的變化。舉例來說，倘港產貨出口貿易每年增加 10%，而轉口貿易增加 25%，則至一九九七年，轉口貿易將是港產貨品出口貿易的四倍。

我深信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將會繼續下去，目前瀰漫中國的經濟緊縮政策和整頓大致不會影響該地區。一九八九年首兩個月的貿易數字可證明這點。轉口至中國的貿易增升 56%，而港產貨品出口貿易亦增升 30%。

主席先生，中央政策組的首項工作計劃，是準備檢討香港與中國的整體經濟關係。這實在是可喜的消息。私營機構在這些聯繫上有甚為密切參與，深信他們多願意向中央政策組提供其知識和經驗。

確保香港能夠繼續取得成就的要素之一，是在各方面維持一個真正和開明的國際觀。香港需要能夠吸引和保持國際貿易，才能對中國有用，所以香港的目標，應該是獨立發展為實至名歸的國際城市，但又同時與中國建立互相倚賴的經濟關係。所謂國際化，就是說所提供的條件能夠符合跨國公司的要求，也就是必須確保專門行業盡量開放。有關這點，當局應迅速解決外國律師聘用本地律師的安排。這也是說，必須在商業和社會上維持一個自由而非壓迫的氣候。簡單地說，就是所有必須做的，都要悉力去做，務求保持競爭能力，不遜色於本地區內的其他國際都市。有可能的話，還要凌駕他們：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標，意味着公私機構同樣須作出重大的承擔和負起責任。

現在轉談勞工短缺問題。近數星期以來，這問題已成為議論紛紜的話題。我認為這種情況是健康的；因為這是一個不容隱瞞的問題，對社會整體均具影響，市民適當地發表意見，是恰當不過的。

最近行政局決定較靈活地詮釋現行有關輸入擁有特別技能勞工的政策，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消息。然而，我促請政府當局，除立即實行行政局的決定外，更應超越有關決定，放眼勞工供求的較廣範疇，從而謀求全盤的對策。此等對策應側重以實際需要而非以「技術」的定義為根據，因為有些人認為問題癥結並非在於「技術」的定義。主席先生，通貨膨脹是我們的頭號公敵，而勞工短缺正是這公敵的爪牙之一。

各界人士對解決方法都自有見解，這點無足稱怪，但沒有人會反對這是必須正視的嚴重問題。主席先生，這問題不應簡單地視作僱主的問題。這是關乎整個社會的事。工商團體最近發表的報告書，對這問題作出詳細分析，並建議若干可行對策。任何曾細閱該報告的人必會察覺，他們並無主張大量輸入勞工，而是清楚地強調必須維護本港工人的地位。

在全面尋求對策時，除了從外地輸入勞動力的方案外，其他方案也須獲得同等注視。倘政府維持非常緊絀的勞工供應政策，則政府自然會樂於研究其他對策，並增加對該等對策的投資。一如李鵬飛議員及潘宗光議員所說，在研究和發展、在自動化和生產力等方面，可以更上一層樓嗎？可否在稅制採取鼓勵措施？我促請政府研究此等問題，同時亦考慮問題的其他方面，例如可增加什麼支援服務，以加強培訓工作，及使更多婦女或學生參與經濟活動。

本港經濟的長遠趨向，以及這趨向與勞工供求的關係，亦須予以剖析，以便發展一項實際行動計劃。由於香港正邁向一九九七年，而我相信將會成為中國南面廣大經濟領域的一個經濟中心，故香港的經濟現正處於過渡期。雖然與中國大陸分開，但香港卻在經濟上與中國其他各省互相依賴。當我們在過渡期間向前邁進時，必須就勞工問題採取較靈活的短期方針，以確保本港經濟能不斷繼續增長。有關「自然演變」的論點，可從兩方面爭論：若企圖過分急進地爭取成為高成本服務中心，並在此過程中淘汰製造業，則是十分危險的事情。這樣會使香港經濟失去平衡，並可能需要過分依賴中國大陸。

一個與勞工短缺有間接關係的問題，是公務員人數。根據其編制，現時尚欠缺 1 萬人。

主席先生，過去六個月來，我有機會與較廣闊層面的公務員接觸。我須先說，這批為社會服務的人員的質素、努力和熱誠，無不使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本港的公務員應該為世界其他各地公務員所景仰。雖然如此，正如財政司所說，公務員人數必須加以控制。相信勞工短缺問題應使我們集中注意力，在適當機會削減官僚架構的程序和加速決策過程，從而節省人手。

削減中央官僚架構的程序，應會在有需要的地方，通常是在外圍，提供更多支援。或者應該進行更多內部組織和工作方式研究，以找出能夠精簡程序和減省人手需要的環節。文牘往來可否更簡潔？在若干情況下，可否根本刪除文件上的工作？這裏有一個簡單的例子。查看一下零售業的規則，發覺單一個銷售點便可能需要領有多至 12 款不同牌照。公營和私營的機構要辦妥全部有關文件和審核這等文件所需的人力必然龐大。另一個例子是有關執照，例如駕駛執照換領年期的質詢。現時規定每三年換領一次。為何不把續牌年期定為六年，或仿效英國的做法，把年期定得更長？

最後，我想談談基礎設施的發展。

對於當局建議開始預留款項進行基礎設施工程，特別是興建新機場及有關發展工程，我甚表歡迎。我知道政府各有關部門正極力加緊工作，完成各項研究，以便可在本年年底前作出決定。此

項工程可以加強人們對香港的信心，而且，基於現有機場的吞吐量會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現飽和的非常實際理由，興建新機場的重要性，實毋須贅言。

雖然基礎設施計劃所涉及的較廣泛問題，亦必須列入檢討範圍之內，但我們不要忘記，較早時有關赤鱘角的研究也費時七年才告完成，倘機場由獨立機構用異常快速的建築方法興建，其所需時間可能仍然大致相同。主席先生，香港興建新機場的需要，不單是日益明顯，而是極度明顯。

鑑於啓德機場處理客運和貨運的能力可能會在新機場建成前數年已達到飽和點，爲了盡量減少經濟方面的不利影響，我們現在便應採取行動，探討其他一切辦法，以確保在遊客人數方面至少可以繼續有中度的增長。這與旅遊業的重要性及有需要維持旅遊業的增長有極大關係。在過去六年，遊客在本港的開支在本港生產總值所佔比例由 4.7% 增至 7.8%，估計至一九九三年更會增至 10%。除發展基礎設施外，我們亦需提高對遊客的禮貌水平，使他們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們須對污染情況施加管制，並須解決可能令本港旅遊天堂美譽受損的問題，特別是旅遊業人士日益關注的通貨膨脹問題。酒店業已作出極大承擔，在一九八七年年底，本港的酒店房間有 21000 個，預計在一九九二年會增至約 4 萬個。順帶一提——在此我可能需要重覆較早時提出的意見——數目如此龐大的新建酒店房間需要大量人手，當局應給予該業人士較大自由，准許其在需要時從海外招聘員工，從而適當地承認私營機構在這方面的巨額投資的作用。

總括來說，主席先生，倘若我們能保持經濟強勁，香港將會繼續取得卓越成就，這對整個社會均有裨益。在此重要期間，在本港體系內運作的各個部份——貿易、金融及工業——必須互相配合，使它們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本港的公務人員效率超卓、盡忠職守；本港的私營機構極富創見，發展業務，幹勁沖天，非其他地方所能比擬；本港市民的教育水平亦日漸提高。讓各界人士攜手協力，使香港繼續穩步向前。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蘇周艷萍議員致辭：財政司在本局宣讀八九年度收支預算案後，我相信全港市民最關注的兩個焦點，第一是政府如何處理八八年 142 億的歷史性巨額盈餘，以使香港人可以共同享受財政司所說的「經濟繁榮成果」；第二是在連續三年的經濟蓬勃期後，面對可能出現的調節期。

首先，我就稅制與公共開支政策提出意見。

本港的稅制一貫的首要目標是穩定收入，這種審慎的前提無疑是值得稱許，但同時稅制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缺點，也是多年沒有改變過的，一直受公眾批評，對此我們也絕對不可視而不見。

今年財政司照例把提高個人「免稅額」形容爲「減稅」，但其實只是按通脹年率調整，以至今年提高至 3 萬 9 千元，即是提高 5%，但相對去年 10% 的工資增長，加上過往幾年免稅額增加，一直追不上通脹，累積下來，仍然會令到很多低收入階層人士跌入稅網。因此我建議進一步提高至 4 萬 5 千元。



雖然財政司提出減少「標準稅率」0.5%，但沒有將最高邊際稅率下降，因此，受惠的是少數高收入的人士，對於大多數中等入息階層仍然沒有多大幫助。

這個「夾心階層」不能享受大部份的福利服務，又無公屋優待，加上沉重的通脹壓力，不僅未有因社會富裕而享有相等的經濟利益，反而是現行稅制中受到最不公平對待的一群。

我建議起碼將最高邊際稅率降低 10%「應課稅入息實額課稅階」，自一九七三至七四年沒有作出調整，因此，由 1 萬元，加至 2 萬元，並且以後隨經濟情況作出調整。

在巨額盈餘的背景下，而大部份市民仍然沒有從現行的直接稅制度中，得到經濟蓬勃的回報，財政司竟然重提徵收「銷售稅」的考慮，實在令人失望，「銷售稅」不可行呢？譬如該稅項會不會太繁複，容易誘使他人逃稅？又譬如即使從批發層面徵收，會不會牽涉龐大的額外行政費用呢？我相信理論上，這類技術性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但是，面對社會上一片反對聲音，我們須要問：「銷售稅」應不應該實行？現行的直接稅制仍然存在很多要改革的地方，尤其對中下階層照顧不足，加上香港社會福利事業的水平，是人所皆知的，即是說，銷售稅對於中下階層生活開支的壓力，是完全不能在其他方面抵銷的。因此，如果在普羅市民沒有實質和心理支持的情況下，如強行銷售稅政策，公眾的不滿和抗拒，是難以估計的。稅務政策牽涉的往往不單是賬面數字，而是更廣泛層面的社會原則；稅制不單是追求大幅盈餘，而應以公平和效益為目標。

至此，我希望就預算案中的公共開支政策提出意見。

財政司一再強調，抑制公共開支，是為避免刺激通脹。按照財政司的解釋，通脹的成因是充分就業，導致工資和物價上升，但其他沒有充份注意的原因，例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在目前的聯繫匯率下，港幣自一九八五年平均計算，港幣匯率指數已下降 17%，因此提高利率亦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脹，加上中國方面的通脹加劇，對於香港亦有很大壓力，通脹成因很複雜，必須一一面對的，而不應單獨歸咎於已經不足夠的公共開支上。

我們社會面臨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其實並非通脹，而是人才不斷流失，長遠來說，政府如何對未來人力資源作出長遠投資？這包括教育、醫療、健康、環境衛生等各方面的投資，從而提高市民整體的質素。這是目前政府大有能力做到，而且必須盡力去做的當前急務。

今年教育的撥款，佔政府總開支 16.6%，比去年的 17.2% 更少，近來關於各程度的學制問題，在社會上都掀起大辯論，其中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政府對於教育事業的發展，應作出什麼程度的承擔？香港的教育經費，一向只佔國民總產值的 2.7% 左右，比較英國所用的 5.2%，美國的 6.5%，以至台灣的 8%，都是偏低的。

教育是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支柱，我絕對反對政府以經濟理由，以省錢原則，作為改變學制的理由。

財政司在教育、社會福利、醫療各方面的開支都堅持緊縮政策，但在基金撥款上，則是非常慷慨的。除了撥 177 億元入各基金外，另預留 70 億轉撥「發展貸款基金」，主要用來進行工務工程，以及投資各法定機構的計劃，目前仍未訂定詳細安排。換句話說，這又是「未雨綢繆」的策略，也許，這是審慎的做法，固然是件好事，不過卻存在一連串疑問。

各種基金如何運作？好像房屋委員會這種由公營轉為法定機構的計劃會否推廣？另外，九廣鐵路與地鐵這類公營公司不斷因經營手法、服務質素而引起強烈批評，反映出政府對公營公司的控制大有漏洞，市民都關心政府怎樣改革與公營公司的關係，保障納稅人的利益，但一切有關如何有效使用基金資源的疑問，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都找不到答案。

以下，我希望就預算案對工商界發展的部份內容提出意見。

財政司把「資本免稅額」，由 55% 提高至 60%，作為鼓勵廠家購置機器及輸入新科技，是更實惠的支持。循此推論，我建議財政司進一步考慮購置機器是有「折舊免稅額」，鼓勵工業界改進生產機械化的水平。

而更基本扶助本地工業發展的方向，應從成立工業科技研究中心着手，尤其香港大部份廠商屬於中小型，對於風險承擔和新產品開發研究所需的龐大經費，是不容易應付，本港在地區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已經在這方面紛紛起步，政府不應在這方面再拖慢步伐了。

在本港工業發展的課題上，現時勞資雙方都集中討論輸入勞工的可能性。我首先表明立場，就是輸入勞工的負面影響極可能比正面效益為多，因此考慮時，必須確保對社會民生產生最少的不良影響。

目前爭取輸入勞工的行業主要是建造業，及部份製造業等，建造業勞工短缺及工資上升的現象，當然與近年地產業蓬勃有關。但地產業會否放緩，要視乎市場的承接力，也即是說，個別行業的興旺是週期性及有極限的，對勞工的需求也會有升降調整的。政府必須考慮應否因此改變及重訂一個影響深遠的勞工政策。

至於在製造業的發展方面，工資上升是與工人技術水平及教育程度提高，或者轉投服務性行業有關的，是本港工業轉型的必然後果，如果此時為了減低工資而大量輸入非技術性勞工，無疑拖慢了工業轉型的速度，甚至可以說是走回頭路了。

而對於為本港繁榮作出貢獻的勞工階層來說，也是不公平的。雖然部份資方提出輸入勞工的工資不會低於現時本港工人收入，這其實是將工資升幅交予資方控制，而不是由市場供求情況調整。

最後，我們必須考慮輸入勞工所引起的社會成本，其實是大部份由納稅人承擔的，這包括對各種社會設施的壓力，例如交通、住屋、治安，還有社群中間文化整合的問題，因此，輸入勞工的可行性，並不單純是技術性的問題。我希望政府保持堅定的立場，公正持平地衡量各個階層的意見和利益，從長遠的角度制定一個真正幫助本港經濟健康發展的勞工政策。

總括而言，我相信全港市民都希望財政司作出的承諾，使社會上各個階層，能真正分享到「社會經濟繁榮的成果」，能夠從公平而有效的稅制中、從資源充裕的公共服務中及合理的經濟投資政策中，得到實踐，否則，即使每年都創下「巨額盈餘」的佳績，對普羅市民來說，可能不過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數字而已。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每年的預算案演辭中都會提到許多問題，我希望談談一些有關工業、貿易、勞工的問題。從經濟角度而言，香港在國際上舉足輕重，本港的生產總值達 4,250 億元，平均每人生產值為 1 萬 1,000 美元，數目相當可觀。

現在，我們擁有工商業及勞工，因而也擁有推動香港這部機器的燃料。不過，政府亦應盡力，確保這部機器在良好的環境中有效運作。

財政司在他的演辭首尾部份都有提到「互相沖擊的壓力」。

這些壓力依次為：

通貨膨脹；

怎樣處理預算盈餘；

怎樣在進行主要基礎設施計劃，例如興建新機場時，不會使經濟嚴重過熱。

我現在可以預見若依據財政司建議的方法來平衡這三個問題定會引起嚴重的矛盾。因為若本港的經濟現已過熱——主要是因勞工短缺而起——我們怎能考慮在短期內進行主要的基礎設施計劃？財政司似乎很快就要決定如何運用本年度的 140 億元盈餘（以及約 600 億元儲備金），而不會令已經過熱的經濟變成熾熱的通脹地獄。

財政司似乎建議將資源分別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以及用於投資的新設基金。這樣就可為新機場及其他工程提供資金。不過，無論私人機構會否參與，政府若興建新機場，通脹壓力定會提高。

主席先生，若本港的經濟現已過熱，則在年底之前，經濟會更加熾熱。財政司應解釋他擔憂的通脹問題為何會在短短數月內突然消失。簡而言之，財政司給他自己和我們一個基本的哲學矛盾，我在稍後會再談這點。現在我想談談本港一般的經濟狀況。

本港的經濟發展現已達到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本港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已無可避免地愈加緊密，無論是在出入口或轉口貿易方面，情況皆是一樣。財政司所引述的數字正是有力的證明。

本港的經濟現時非常倚賴中國。參與本港經濟發展的中國勞工達 200 萬人。我們定可再進一步開發這方面的資源。

至於那些不能利用這方面資源的行業，我們必須制定適當的計劃，替它們從中國或別處輸入勞工。

我曾在本局談及勞工短缺的問題——當時我以勞工饑荒稱之。

當時我特別提到製衣業的困難，因為該行業面對的勞工短缺問題特別嚴重。各位議員可能仍記得我在去年十一月提到製衣業的問題以及該行業需要聘用熟練技工。我並不同意政府的立場，認為製衣業工人實非技工，不准到港工作。

製衣業以專門技能所須付的工資聘請熟練技工工作。這行業再不能進一步自動化。我們以第一時間運作，常須趕及限期，而這點是全面自動化無法做到的。時裝款式每月都可能變。

我亦要提醒各位議員勞工界因多種纖維協定（多纖協定）而引起的問題。多纖協定並不理會工人的國籍，而祇認定工人實際工作的地區。故此，製衣廠商並不能遷廠至中國生產。若外地勞工能到港工作，則不違反多纖協定的規定。這樣我們才不會失去出口配額。

最近我們亦曾與貿易署磋商。討論能否放寬產地來源的規則，使衣服的某些部份在中國生產。貿易署基於美國會因此而將本港的配額給予中國，反對該項建議。

既然連在中國進行部分生產過程這辦法也行不通，唯一的解決方法似乎是輸入勞工了。

我們以香港為製衣業的最後基地，但因最近勞工短缺，該行業在過去三年已失去了 5 萬名工人。

自我在十一月十日發言以後，九大工商團體的聯合作小組已就這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工作小組的報告提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議。小組提出以短期合約方式由中國或別處聘請半熟練技工到港工作，合約期由六個月至兩年不等。

我個人認為僱主有責任為合約工人提供住宿及交通工具。以獨身的年青勞工來說，應無教育、社會福利等問題，要提供的可能祇是起碼的醫療照顧。不過，我則反對用汽車從深圳運送工人到港工作，因為工人在經過長途旅程後，再難望他們可以有效率地在本港的地盤、酒店或工廠工作。

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參照星加坡所採取的輸入勞工建議。星加坡的經濟高度倚賴半熟練的合約技工，約有 15 萬海外合約工人分佈在建築、製造、零售貿易、酒店、造船及修船等行業。星加坡的勞工短缺問題現已明顯獲得解決，亦無因此而引起任何不利社會及經濟的問題。

我認為勞工短缺是引起通脹的主因。財政司在指出「本港經濟迅速增長，失業率下跌至歷來最低水平。結果是經濟過熱，導致通脹率上升。」時，已隱晦地接受這點。但他在處理通脹問題上，未免過於聽天由命。他以逆來順受的態度，指出我們可對付通脹的辦法寥寥可數。他希望本港的經濟，如他所說「會作出調整」——不管這是甚麼意思——並使本港獲得成功。

我亦想談談公務員人數增加 7200 人的建議，我肯定這項建議一旦實施，定會對現時的勞工供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也許這 7200 人當中，大部分是警務人員及懲教署人員。但政府為何不同時在其他部門削減公務員人手，因為在一些部門裡，舊式填表格的情況依然成風。

政府應採用更有效率的辦公室管理方法、現代化資料系統、資料儲存方法以及有效的會計制度。如其他機構一樣，政府可行的解決方法是多利用現代化科技，包括廣泛使用電腦及自動化系統等。私人機構遇到勞工短缺問題時，政府正是鼓吹這種解決方法，現在是政府身體力行的時候了。

我在發言之初，提到我在細心閱讀預算案演辭時，發現到一些基本的信息。該份演辭有很多主題，不過，一些基本的假設實在令我感到不安。

我想先談談公共開支與通貨膨脹的平衡問題。我們早可預料到財政司會提出要嚴格限制公共開支。我們在一些事情上當然要緊守深謀遠慮、小心行事的原則。我同意有需要加以控制。一如財政司，我並不希望見到通貨膨脹、利率高企、開支過度等因經濟過熱而引起的弊病。

但說過這番道理後，財政司卻陷入連串的矛盾。他說：「在目前的通脹情況下，公營部門設法減低其佔用現有資源的比率，是特別有好處的。」

另一方面，他並無運用多大邏輯，就要我們注意他所謂「矛盾之處」。這「矛盾之處」就是公共開支是必需的。他說：「如想本港經濟在未來數年內繼續發展，基礎設施架構的改善，實在不容過分拖延。」

他現在顯然是說機場，以及其他有關的大型建設。本港的經濟明顯過熱。我不肯定財政司是否可以徹底解決他所謂「矛盾之處」。

他似乎是說我們切勿花費，但我們不能夠不花費，事實上，亦不應該逃避花費。

其次，讓我談談一般的貿易問題。我很高興財政司提及本港持續令人滿意的貿易表現。在這方面，本局及市民大眾都不應忘記本港近年的出口穩定，工商業的一般表現亦是如此。

我們希望有持續增長，我們亦希望能自力更生。

故此，當一九八七年十月股市崩潰，財經界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工商業依然如常運作。

工業家斷然不會因自己幹了蠢事惹禍，而在凌晨四時致電財政司求救。財政司可能須先考慮這點，然後才決定應否將他自己及香港孤注一擲在財經及服務性質的行業。

主席先生，我想談談的第三點是有關本港的預算盈餘。在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盈餘達 140 億元。

財政司指出我們不能因為有了他所說的「金鑛」，就任意花費。簡而言之，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從市民處收集金錢，就是為了儲存現金。

不過，若財政司因害怕加劇通貨膨脹而不願花費盈餘，那麼他為何要收集該筆款項呢？納稅人的數目到底並不太多。很多議員提及的中等入息人士或夾心階層實在應獲得較好的待遇。

社會上一些多疑的人士認為財政司打算送「禮」給中央人民政府。不過，容我提醒他們，日後的特別行政區已經擁有為數約 120 億元的「金鑛」，此外，並獲得約達 50% 的賣地收入。

容我亦提醒財政司，他的「金鑛」無論花不花用，都會受到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不過，若他打算將盈餘作為新機場的部份付款，那麼他就要摒除預算案的大原則，即適當地平衡他的「互相沖擊的壓力」。

主席先生，我並非否定我們所面對的經濟挑戰。

不過，財政司先生，請問你計劃怎樣處置你的「金鑽」呢？我建議你大可將盈餘用來興建機場及其他主要設施。不過，爲了同時壓抑通貨膨脹，以及不與私人機構爭奪工人，你必須輸入熟練或非熟練的建築工人來爲你進行工程。

主席先生，現在我想談談反傾銷法例的問題。《經濟展望》提及因歐洲採取反傾銷行動而產生的問題。該刊物正確指出「因反傾銷而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產生的種種爭議，可能會對輸往歐洲市場的本地產品產生一些不良影響。因此，預測一九八九年輸往西德的本地產品只會增加 2%。」

財政司的預算案演辭未有提及的另一事項，是有關一九九二年歐洲的問題。在短短的 32 個月內，「歐洲堡壘」的矛頭便會直指香港及很多其他國家。

歐洲各國在學習適應新成立的真正共同市場時，會遇到不少問題。不過，一九九二年對香港工商業造成的困難會頗爲嚴重。

單在過去的 16 個月內，歐洲經濟共同體便提出八種反傾銷辦法。我們已學會面對「保護主義」。可惜，就國際貿易而言，保護主義已變成未來事物的一部份。

一九九二年，我們將會目睹 12 個歐洲共同體國家終於團結起來。該 12 個國家將會組成一個共同集團，設立統一的對外關稅，以對抗所有外來貿易。大部份的香港商人將會被摒除於這個貿易集團的門外。該貿易集團規模最大，擁有人口 3 億 5,000 萬。

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會計算產品在香港市場的價格，然後將該價格與出口價格比較。

但我們的本地市場畢竟極爲細小，本港 90% 的產品都是出口的。

我知道去年十一月及十二月，歐洲共同體制訂反傾銷程序，以對抗本港製造細熒幕彩色電視機、相片簿、卡式錄影帶的廠商，而最近「牛仔」布製造商亦受牽連。反傾銷法例是突然而來的，帶來痛苦及禍害。

歐洲各國及其他地方的政府，好像癮君子般，在推廣反傾銷行動方面已上了癮。一旦行動開始，即使反傾銷人士沒有充份理由或完全沒有理由，要他們停止行動也是困難的。我們由此可見這是極大的隱憂。

我們希望政府全力支持，使世界各國清楚了解我們的情況。

主席先生，我並非僅爲工商界人士請命。

最近，香港人流於太過關注不必要的內部爭論。很多小組、社團及專業團體都花了太多時間，爭取自身利益。

因此，醫生、工業家、工廠工人、公務員等最近都成為新聞界報導的對象。

我很希望上述問題不會導致社會人士彼此不和。我們必須提防社會分裂。我懇切盼望香港人能夠恢復從前的合作精神。

預算案確實包括了很多既合理、又受歡迎的措施。我完全贊同適量減稅的建議。第 106 至 111 段提及增加費用及雜費，我接受此項建議，因為增幅合理而且有限度。關於批發銷售稅方面，根據財政司提出的理由，我認為他的概念會有成效。我為此等建議鼓掌。

我認為財政司已提出有用的預算案。不過，基本上，我認為此財政預算案的主要目標略為混淆。勞工短缺、遏止通貨膨脹及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計劃之間的矛盾無疑使人憂慮。

我極希望來年財政司會向我們發表同樣有效用的預算案，但上述矛盾卻能盡除。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預算案內的建議。

陳英麟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曾表示要改善教育，而今年的部門開支預算，教育署亦第一次將改善教育質素列為目標之一，但教育的撥款，只較去年增加 5%，當中只是部份用在改善教育質素，而未來四年每年平均的實質增加，亦只不過是 4%，即是有減無增，令人感到改善的目標很渺茫。我認為，教育質素不能提高，應歸咎於政府吝嗇用在教育方面的開支。

現行以「量入為出」亦即「分餅仔」的財政策略，雖然可以保證能制訂出盈餘預算，但往往卻窒息了政府部門不少大計，令長遠計劃受阻，導致政府部門更加沒有理想，只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但我不相信我們的決策者是如此沒有理想，特別是在教育方面，但可惜由於受制於財政撥款，以致全無理想可言。

主席先生，教育是不能夠沒有理想的，我們年青一代越來越實際，以講求眼前事物不知何去何從，教育要負上大部份責任。

古語有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的政府和議員亦說教育是社會上一項長遠的投資，故若要將教育辦好，絕不能讓教育當局失去理想。現今令人不滿的教育問題，包括學生中、英語文能力差、中學採浮動班制、小學半日制、幼稚園教師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課程未能配合實際需要、私校質素參差、教師與學生的比例高、文法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不能相通、學校輔導主任和社工人手不足、教師又沒有足夠訓練應付問題學生，以及教師普遍視教育工作為一種職業的觀念，缺乏使命感，而培養出來的學生，較好的是沒有明天，壞的則淪為不良青少年，青少年問題亦是越來越嚴重，要社會福利署去補救，甚至要由警方、法庭和懲教署去處理。我認為，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教育部門缺乏目標所致，故現今教育署能勇於面對現實，暴露自己的弱點，在預算案內，首次白紙黑字寫下要改善教育質素，這是非常值得讚賞，我希望財政司能想盡辦法，找些額外資源加以配合，不要將其窒息。

不過，要能說服別人給你多些錢，教育署當然先要做好份內工作，在執行層面上，必須將提高教育質素的目標具體化，交各部門徹底執行，令每一位員工都能認真確認目標，朝着去做；至於

在管理層面方面，要改變現行僵化的處事作風，將現有資源充份發揮，例如有很多校長和老師均認為，視學制度是可以監察教育質素，但現今教育署每三年定期視學一次的制度，則大有問題，舉例而言，若中一的英文水準差，要待三年後才被發覺，屆時已有三屆的中一學生受害了。換言之，若學校辦不好，會對學生造成很大的損害，請問教育當局，有否考慮過這個問題，改用抽查或充份調動現有的視學人手，發揮視學的監督功能。

此外，教育署傳統的保守作風，亦應徹底糾正過來，例如本局同僚張子江校長在本局提問影印機的問題，足見教育署是一個如此保守的部門，連一些學校的必需品，亦要勞動立法局議員向中央爭取，怎不令人氣餒，影響我們的士氣呢？

至於在決策部門方面，我認為，要對現行既定的教育目標，加以檢討，因現今的目標，是為每一位適齡兒童，提供他能力所能吸收的最好教育，而成本是家長和社會所能負擔的，我想，這是財務科最鍾意聽的話，但若繼續抱着這個目標去辦教育，教育的質素只會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我同意總督閣下所說，「我們必須擴展本港的教育設施，以便可以繼續走在科技發展的前端，並訓練九七年後負起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責任的人材。」但我認為，培訓人材除可提供市場需要外，更重要是配合個人的全面發展。為何有如此多家長嚮往將其子女送入國際學校讀書，因這些學校除傳授知識外，亦非常重視與家庭的關係，啓發他們的思想，廣闊他們的視野，更能為自己計劃未來，對自己的國家有歸屬感。這些都比香港傳統教育優勝得多，亦是現行教育目標所缺乏者，故政府必須認同個人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才不致於會吝嗇用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現存問題自可迎刃而解了，而教育質素的改善才可實現。

我最近閱讀過由本局同僚中央青年政策委員會主席譚王葛鳴議員於今年一月發表有關青年政策研究報告書，講述青年政策內容的一節，令我喜出望外，因當中所言者，正好反映出我認為教育應有的內容。我在此謹呼籲，教育統籌委員會成員要看該段文字，更希望本局全體同僚支持譚王葛鳴議員朝向報告書所指的方向，合力改進現行的教育制度，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美好的將來。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下午四時二十八分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至此暫停，略作小休。

下午四時五十三分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

司徒華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過去一年，政府的空前盈餘，反映了香港經濟的空前蓬勃。但與此同時，移民潮的急漲，卻又反映了對前景信心的進一步動搖。有人一直說：只要搞好經濟，香港便會有光明的前景。看來，擺在眼前的事實，說明了絕大多數的人並不相信這樣的說話。否則，



又怎會出現上述相反的現象呢？政治問題，總得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倘若對政治問題，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時日一久，必然會影響到經濟。

財政司以遏抑通貨膨脹為擋箭牌，拒絕公眾人士改善社會服務的要求。這個擋箭牌，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小學和幼兒教育上的撥款，只有 3.5% 的增長。這樣的增長，連通貨膨脹率也追趕不上，實質上就是削減。政府銳意發展專上教育，這是應該的、恰當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輕視小學和幼兒教育。小學和幼兒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的根基，頭重腳輕，並不是健康的發展。

六年小學免費教育，已推行了十五、六年，質素亟待提高。幼兒教育早已成為全民教育，但從來沒有得到政府資助，在整個教育事業的大家庭中，有如一個孤兒。政府為什麼偏偏虧待年紀最小的學童呢？

幼稚園教師的待遇，十多年來，社會人士都在大聲疾呼。在當前人材流失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更為嚴重，不但影響到幼兒教育質素不能提高，甚而下降，甚至癱瘓。在這裏，我要為三歲至五歲整整一代的學童和有如他們的慈母一樣的幼稚園教師呼籲：政府必須正視和解決這個問題。

備受質疑的外籍英語教師計劃，仍然繼續推行，在這方面，政府顯得很慷慨。這個計劃，即使真有實效，也只惠及四十多間中學。假如以同等的撥款，來資助全港幼稚園教師的薪酬，她們的待遇便可得到顯著的提高，鼓舞起全個專業的士氣，惠及三歲至五歲整整一代的學童和整個幼兒教育，政府為什麼如此輕此薄彼呢？我要求財政司和教育統籌司給以正面的答覆。

爭取多年，夫婦可選擇個別評稅繳稅，終於在本財政年度開始實施了。但在現行稅制中，仍然有很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特別是中產者仍然是被虧待和被剝削的一群，他們對社會的承擔和所得到的社會服務、社會福利，仍然並不均衡。

中產者受到移民潮的衝擊最大，必須加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他們的歸屬感，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改善他們在現行稅制中的地位。他們的主要要求是：一、提高免稅額；二、取消免稅額遞減制度；三、擴大累進稅率每個級別的差距；四、分期付款購買私人樓宇所付利息，應獲免稅；五、公積金供款應獲免稅。

從昨天到現在為止，所有談及幼兒教育和稅制的議員，都關注到改善幼稚園教師待遇和減輕中產者的稅項負擔，這大抵可以算是本局的共識。

為了爭取夫婦可選擇分別評稅繳稅，我曾對過去兩年的預算案，投了反對票。昨天，財政司問我：對今年的預算案，是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我答他：這次，放他一馬。但先禮後兵，勿謂言之不先，假如明年的預算案，仍然對本局改善幼稚園教師待遇和減輕中產者稅項負擔的共識，置若罔聞，置諸不理，我或會再投反對票的。今年休息一次。

最後，我還談一談輸入外地勞工問題。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某些行業即使真有勞工短缺的現象出現，這也是經濟在轉型過程中，必然發生和必須忍受的陣痛。輸入外地勞工，必會拖延了，甚至窒息了經濟的迅速順利轉型，也一定影響了香港長遠的整體的利益。我暫且不去談論，共

同分享經濟繁榮、破壞現存的勞資和諧關係、由此引致的種種社會問題等等。我堅決反對輸入外地勞工。全港工會和勞工，必須團結一致，警惕舊瓶新酒的把戲。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子江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今年財政盈餘高達 142 億元，實在出乎意料，在部份人因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而離開的情況下取得這樣的成績，尤其令人難以置信。這的確是奇妙，而且顯示出香港這地方往往會有難以解釋的事情發生，尤以經濟發展方面為然。

在很多方面，香港人已表現出其堅毅不拔的精神及機靈的經濟頭腦，令人深感欽佩；但可惜當局卻未能善用龐大的盈餘，進一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首先，我想談談教育方面的撥款。本局同寅陳英麟議員剛才就教育撥款所作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的撥款只增加了 3.7%，增幅絕不足夠。而學前教育的撥款在教育署開支總額中所佔比例，甚至連 1% 也未達到，我認為是極不合理。近年來社會人士大聲疾呼，表示當局應撥出更多款項資助學前教育，我懷疑有關方面是否置若罔聞。倘若根據現行政策，政府無意為學前教育提供足夠的財政資助（此事已備受爭議），就應該容許辦學者收取較高學費，以便獲得足夠的經費去改善服務質素。如果幼稚園經費不足。我們怎能期望它們聘請受過訓練的教師，或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務？在產品欠佳的情況下，實施學費資助計劃等於資助顧客購買不合意的產品，又有什麼意義？現行的學費資助計劃實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小學教育方面，很多人清楚明確地要求當局廢除半日制小學，或至少將高小班級改為全日制，但卻未見收支預算案提及這方面的建議。政府只向全日制小學發給一筆數目很小的額外補助金，以及撥款提供午餐桌和長凳，作為額外援助而已。這種做法是否足以鼓勵半日制小學轉為全日制呢？增添人手方面又怎麼樣？要一名文員照顧 36 班學生是極為不足。政府必須立即採取積極行動，由小六及小五班級開始，逐步廢除半日上課制度，並應根據每個學校區的情況，盡力推行這項計劃，我極不想看到當局首先進行為期兩年的檢討工作，再花費三年時間進行商議及策劃，然後才採取進一步行動。須知拖延是罪過，絕對稱不上是美德。

至於中學方面，撥款的增幅為 7.5%，而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的增幅則為 19%。雖然我很感謝政府終於推行了原定於去年實施的計劃，在所有中學增設一個中文教師職位，但我認為政府做得到而應該做的工作仍多。教學工作已愈來愈缺乏吸引力，兩所大學的就業輔導組可以證明，近年來選擇從事教育工作的畢業生已陸續減少。隨著社會的發展趨向更多元化，變得更複雜，加上婚姻和家庭制度逐漸瓦解，管教兒童的工作已變得愈來愈困難。很多兒童都十分頑劣，教師除授課外，還要花費許多時間處理問題兒童，而且很可惜，往往得不到家長的合作和支持。雖然在過去幾年來，政府為學校增設了數個額外教師職位。然而，從編制的觀點而言，他們不能稱為額外教師，因為他們都有指定的任務，例如輔導教學，因此對加強編制人手方面作用不大。他們只是一些負責特別職務的額外教師而已。另一方面，德育、性教育及公民教育和參與社區活動現已成為教師工作的一部份，而在過去五年，上述工作尤其繁重。此外，教師需要處理的文書工作亦每年增多。政府實應開始認真考慮增加對學校的撥款，使校方能增聘文員以分擔教師的文書工

作，以及添置必需的文儀設備，從而提高學校處理行政工作的效率。我認爲在今時今日，既然政府已有大量盈餘，若還說待至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才能撥款給學校購置影印機，豈非荒謬？除提供影印機外，其實政府還應爲學校供應電腦設備，以減輕學校在行政工作方面的負擔。前陣子，當醫生及護士罷工時，部分本局同寅問我：「教師工作愉快嗎？」我回答說：「愈來愈不愉快。」除非我們能夠吸引有才幹的教師加入學校工作及將他們留住，否則本港學校教育的前途會是一片黯淡。

我不打算在這裏討論複雜的浮動班問題。當初決定實施浮動班制時，政府曾向學校當局表示或引導它們相信這只是一項臨時措施。到了 15 年後的今天，浮動班的數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在某些情況下有所增加。不用說，浮動班令人生厭，並爲學生及教師增添不少麻煩。

我想提及另一點令人失望的事，就是政府一直不願意爲學校設立正式的副校長職位。我們曾不斷向當局反映意見，提出要求，但當局卻一再表示所提的理由不夠充份。目前，越來越多學校校長參與社區服務，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很多時校長是需要離開學校處理此等社區工作。因此，學校實急需設立正式副校長一職，以便於校長不在時，確保學校的行政工作仍能有效地進行。以往，每所學校都設有兩名副校長，但現在卻一名也沒有。雖然大部份學校名義上都設有副校長，但他們的職位並未獲得正式承認。最近教育署已接納了學校方面要求設立副校長職位的理由，但據說仍須待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通過，才可付諸實行。主席先生，請問當局能否在下一學年開始在各學校設立副校長職位？

現在我要轉到另一題目，爲本港的夾心階層或中產階層說幾句話。雖然本局同寅在過去兩天已就這點發表了全面意見，我仍想向他們表示我的支持，而我希望他們傳遞的訊息能夠清楚及響亮地傳到財政司的耳中。我認爲本港中產階層並未獲得政府的體恤和照顧。他們名符其實被夾在兩個階層中間，雖然在納稅人之中，他們佔去大多數，但卻享受不到低入息階層的福利，例如較便宜的公共房屋及醫療服務等。

財政司就財政預算案所採取的策略，似乎是設法讓每個人都得到一些好處。我懷疑這是否妥善的財務政策。我認爲將利得稅及薪俸稅的標準稅率削減 0.5%，作用不大。對於根據 17% 或 15.5% 的稅率繳稅的人來說，削減 0.5% 與否，並無多大分別。但若將這筆錢轉用於一些更需要的人身上。以減輕他們的困苦，作用便會大得多。以政府的財政狀況而言，即使給予中等入息階層更大幅度的減稅，仍然負擔得起。

近年來，專業人士及中層管理人員外流的情況嚴重，政府必須採取具體措施，多點照顧夾心階層的需要，使他們不再感到被虧待，並對本港社會更有歸屬感。長期以來，他們均受到忽略，政府現在應該考慮採取下列步驟：

- (1) 將單身人士及夫婦的基本免稅額分別提高至 48,000 元及 96,000 元；
- (2) 取消個人額外免稅額遞減辦法；
- (3) 盡快實施夫婦分開評稅；
- (4) 規定真正置業自住的人士所繳付的按揭貸款利息可獲免稅；
- (5) 規定僱員所繳付的獲准公積金／退休金供款可獲免稅。

至於銷售稅方面，我只想指出，爲着鼓勵中等入息人士留在香港，較可取的辦法是爲他們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課稅辦法，而非徵收銷售稅。

本港政府必須表現出它關心民生疾苦。在變幻無常的環境中，政府必須表現出它正不斷努力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並且決意盡其所能，以維持及增強市民的信心。政府應妥爲運用龐大的盈餘，以達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目的。

主席先生，我謹此提出意見，支持當前動議。

戴展華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賀財政司再次向本局提出一個十分均衡的財政預算案。得聞去年預算盈餘龐大，實在可喜可賀。但我們難免懷疑上述盈餘究竟是由於過度低估政府收入，抑或政府開支過份謹慎，又或者是兩個因素同時造成的結果。

在預算案演辭中，財政司指出政府公務員編制去年增長達 3.9% 之巨，超過原定 2.5% 的增長目標。我覺得這是個令人憂慮的跡象。我們現時不單要研究如何增強生產力和提高效率的方法，亦要探討一下目前的公務員編制制度，看看這制度是否牽涉太多政策科，辦事程序越來越複雜、累贅，影響效率，公務員要出席越來越多部門與部門間的會議方能達至結論或決定？

我個人親身體會的例子，是涉及屋宇地政署的。由於在不少政策的施行上有歧見，該署須進行許多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會議，以致妨礙工作效率和決策過程。倘若我們研究公務員效率的成本，那麼我不單要鼓勵部門主管充分利用我們建議增撥的資源，亦要鼓勵他們檢討現時採用的程序，以確保部門以最高效率和最大的成本效益運作。

新界不少地區的居民經常投訴屋宇地政署的辦事效率低落。例如，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居民申請建屋只需六個星期就可以批核；現在卻要六至九個月以上。

至於發放政府收地補償費方面，土地業權人往往在土地收回後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方獲發款項。如與七十年代的情況比較，現在的阻延成了強烈的對比。此外，在推行新界改善計劃方面，也遇上類似的阻延例子。難怪現在有人說：爲何現在的編制較大、設備更佳、辦事時間卻比前較長？

主席先生，就預算撥款而言，自你在《施政布告》內提出新的鄉區環境改善策略後，政府撥款 680 萬元，以便日後推行鄉區改善計劃。然而，多年來，政府爲鄉區居民改善居住環境的工作少之又少。目前，只有一些小型改善計劃由政務總署管理，另有數項規模較大的計劃則由拓展署負責，而這些計劃均屬於市區邊緣改善計劃。相對來說，大部分的鄉區居民依然備受忽視。

主席先生，你上次訪問新界時，有關官員該已向你匯報行將會進行的改善計劃，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些計劃大部份正受到阻延，原因是它們的規模實在太大，非政務總署所能處理，而由拓展署負責的較小型計劃，則因規模細小往往難於獲優先處理。

主席先生，我想藉著這個機會，籲請當局研究負責全盤統籌工作的部門，以確保鄉區和新市鎮的規劃工作以及建議的工程確實執行，而且要準時執行。

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政務總署的前身（即理民府），除了管理轄區的日常事務外，還要負責新市鎮的整體發展。約在 10 年期間，成功發展了荃灣、沙田、屯門等新市鎮。

發展至今，一切土地事務現時均交由城市規劃處、拓展署、屋宇地政署及註冊總署分擔，而政務總署在土地發展與改善方面所擔任的角色實際已微不足道。因此，有必要加強和注意改善效率、整體統籌工作及就地區發展所提出的建議。政務總署畢竟是日常與民眾接觸最多的主要政府部門。在影響民生的事項如政策及行政程序等方面，負責任的政府理應重新研究政務總署在改善社區發展上所擔當的整體角色。

主席先生，我想提出的下一個項目是越南船民問題。我注意到紀律部隊，尤其是懲教署，佔了公務員編制增長的大部份。這一年來，我們不單在越南船民問題上花費了大筆的金錢，隨着越南船民持續湧入香港，我們可能要面對一個非香港所能應付的更大而又永無休止的問題。

財務委員會再三被要求增加撥款。我們明白當局已竭盡所能去解決這個問題。然而，一開始香港便受到國際不公正、不平等的對待，尤以向我們的鄰近亞洲國家提供資助設立越南船民中心的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為然。馬來西亞及泰國均有收容中心，而他們獲得公署償還差不多全部經費，包括收容中心的建造費用；提供收容服務的香港則僅獲償還部份經費。

我們的紀律部隊迅速劇增，經費來自政府一般收入，但這些人力卻要調往應付數目日增的滯港越南船民。儘管紀律部隊人員數目有所增加，但本港社會卻因為船民問題而未能受惠。我並非說在影響人類生活的事情上，諸如天然災害，香港不應對其他國家人民抱有惻隱之心。然而，過去數年來，香港在這個問題上已盡了應盡的責任，所獲得的回報卻是既不公正，又不平等的待遇。除了找出遏止船民湧入的解決方法外，我們還須比較泰國及馬來西亞所負擔的經費，研究船民問題對本港經濟的影響。

至於財政司所提出的徵稅建議，我感到失望，因為預算案未能藉增加已婚夫婦及子女免稅額和老人津貼，給予中下入息階層更大的稅項寬減和照顧。鑑於現時的通貨膨脹率，免繳稅入息額只作微乎其微的提高，也令低薪人士大失所望。我認為，恐怕加劇通脹這說法並未能合理解釋財政預算所建議微不足道的稅項寬減。

我想提出的最後一個項目是醫療服務。從預算案中，我發覺醫療服務撥款額增加約 9%，以便改善這方面的服務。除了將會普遍減輕公立醫院現時擠迫情況的新地區醫院外，改善設備、工作環境及解決醫護人員目前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工作卻進展甚微。醫療服務所獲增撥的經費，大部份被薪酬增長、通脹引致的醫療設備及藥物成本上漲所吞噬。難怪行於本年年終啓用的最新屯門地區醫院並未進行電腦化。

隨着本港社會日益富庶，市民自當期望有更佳、而質素有所改善的醫療服務。這些服務固然昂貴，經費來自政府一般收入，資助率更高逾 90%。此外，本港公立醫院的一等病床和免費牙醫服務，受惠者主要是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我想藉著這個機會，促請政府在醫院管理局於一九九〇年四月成立後，研究是否可由公務員償還某一規定程度的醫療費用。

財政司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及要預留一筆基金，供未來 15 年基本設施發展計劃使用。我認爲這是明智之舉，因爲我們必須確保基本設施的長遠策劃發展不受香港經濟發展的波動所阻誤，以便長遠的計劃可以井然有序地策劃、展開，免致影響香港的整體發展。

然而，預算撥款的任何開支分目均和生產總值有聯繫。以醫療服務爲例，資助率超過 90%，而病人毋須審查入息，服務質素實難望有任何顯著改善。假如我們繼續採取現行的預算撥款政策，就醫療服務所發表的施葛顧問報告書提出在公立醫院提供乙等病床的建議，將會永遠沒法實現。

難道我們不能撥出一些款項，以便未來 10 年發展醫療服務、改善質素，並且成立全民醫療保險計劃，負擔部份經營及發展成本？此舉起初要一筆開辦經費，但換來一個較公平的供款制度。這項計劃對中等入息人士有利，因爲他們願意爲醫療服務多付出一點金錢，但又負擔不起私立醫院現時所提供的服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劉華森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通貨膨脹是今日舉世最大問題之一，各國政府均盡其所能以求加以控制。本港的通脹率較其他的經濟體系更爲嚴重，因爲除內部產生通脹外，還受到外地的影響。

我須祝賀財政司，因爲他的預算案慎密周詳。我絕對同意他採取的策略。他在稅收寬減的水平與公共開支的增長間求取合理均衡。我相信藉着部份盈餘撥入儲備金，這項財政略策可略爲遏止本港通脹率的增長。

經過一段經濟持續增長和財政預算有龐大盈餘的期間後，社會各界定有許多人要求增加開支。但我肯定這些盈餘最好應是投資於本港主要的基本建設工程，以維持香港作爲一個國際都市的地位。我們亦不應忘記進行其他投資以改善民生，使香港成爲市民更美好的家園。在今天我們希望吸引中產階級人士於九十年代和以後繼續留港作出貢獻之際，此點尤爲重要。

正如主席先生在去年十月《施政報告》所說：「我們須發展社會服務和醫療服務，使香港成爲一個健康和充滿關懷愛心的社會。」

本港人煙稠密，路上交通繁忙，傳染病因而非常易於傳播。因此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改善本港衛生設施。

我們現在全力進行一項雄心萬丈的醫院興建計劃，完成後本港人口與病床的比率會達到可接受的水平。

同時，我亦歡迎當局成立醫院管理局，以處理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提供醫療服務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現時醫院組織和管理架構缺點甚多。我相信必須引進專業管理概念，加上先進的資訊科技，以改善工作情況和提供較佳的環境，使醫務人員能有效地服務。

不過，除非能靈活提供足夠的額外資源，否則單是將醫院服務的管理交由一法定機構負責，仍未能取得最佳效果。醫院管理局需要大量投資以支付開辦之初的開支，例如改善醫務人員的服務條件，採用最新資訊科技設施，添置設備和其他有特殊用途的新設施。

政府和醫院管理局之間有靈活的財政安排至為重要。為求靈活，當局可擬訂首次財政預算方案，而預算的增長率，可以病床數目和本港生產總值增長的一個比率為根據，藉以每年三次，每次撥給醫院管理局的整筆數額。醫院管理局必須靈活處理財政，不應遵從指示，墨守政府現時的撥款成規，即每年須與其他部門爭相要求從政府一般收入撥款。

採用每年撥款三次的方式，醫院管理局便可於豐年時將盈餘撥入儲備帳，加以積聚。日後資金不充裕時，這盈餘便可用以抵銷經營赤字。為防範不能預見的情況，政府應向醫院管理局提供先行訂有若干限額的貸款基金。

主席先生，當考慮有政府津貼的各項醫療收費時，我們亦應一提本港社會中產階級在比例上可說缺乏福利。由於現行制度存有缺點，他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使用私家診所和私家醫院的設施。他們通常還須供養年老的父母，和為他們所需的差不多全部醫療衛生服務繳付費用。

因此年長的市民應獲免費提供特殊健康護理服務，他們過去對本港經濟繁榮有貢獻，但卻沒有中央公積金來照顧退休後的生活。對於本港日益老化的人口來說，這點至為重要。

主席先生，讓我談談本港的政府收入策略。我相信，若希望香港作為一個低稅率的國際都市而繼續發展，必須維持低稅率的直接稅。因此我們應尋求較不受本港經濟活動循環所影響和較不倚賴直接稅的新關稅收來源。我個人認為，銷售稅是個好的稅源，但我知道開徵這類稅，不論是在批發層面抑或零售層面，都有許多問題難以克服。我認為，除非所有問題都可解決，否則社會人士不會接受銷售稅。謹祝財政司能順利處理此事。

現在讓我提供另一可供考慮的範疇。多年來，許多擁有特權的公用事業公司都享有收益和利潤兩方面的增長，例如本港的航空公司、貨櫃碼頭、海底隧道等。

除通常收取的費用收，政府並無因擁有其權益股而取得部份利潤，唯一例外的是可從海底隧道公司分得利潤。

既然我們對本港日後經濟增長有信心，則這些專利公司亦應繼續有類似的增長趨勢。政府應考慮透過擁有權益股而分享其業績興旺的好處。我們可以想像，倘政府擁有本港航空公司或其他專利公司 25% 左右的權益，則政府在這方面的收入應會是十分可觀。

我深知，政府在這方面謀求收入，有許多贊成或反對的爭論。有人會辯說這專利公司是「私營企業」，政府不應干預。但我所提議的是着眼於透過投資收益而分享其興旺業績，並非在管理上加以干預。由於本港還會進行由私營企業資助及運作的新工程，如興建新機場，及分配或重新賦

予專利權，故政府取得其權益股的機會多得很。謹建議政府的中央政策研究組詳為考慮此類稅收來源。

主席先生，我陳辭如上，謹支持當前動議。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所提交的財政預算案平淡無奇，而且幾近沉悶。這些詞語，人們通常用以形容我所從事的行業，但對金融業人士來說，它們卻反映當局努力不懈地編撰該預算案，因而帶來信心。整體來說，預算案的建議使我充滿信心，認為香港現正朝着正確路向邁進，當局在下亞厘畢道所提出的建議，雖然不甚清晰，亦日漸為人所理解。我所指的是以五年為一單元的持續預測經濟辦法——即中期經濟預測，以及近期提出的有關公營部門財政改革的建議，我們當然會對該等文件加以批評（希望所提出的都是有建設性的意見），因為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定有可待改善之處。

### 利息稅

以本港稅務從業員的身份來說，我得感謝財政司慷慨大方，撤銷稅務條例第 27 條的規定，從而取消利息稅。然而，從立法者的角度來看，我必須表明所持的保留意見，認為財政司此舉可能過於慷慨。

投資者賺取投資利潤的方式，以及就該等投資徵稅的方式（例如透過股息、利息或某種形式的費用），兩者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股息是在除清利得稅後派發的，故理論上，在派發股息之前，當局已就有關利潤收取十足的稅項，而其後收取股息者毋需再次繳稅。然而，利息則有所不同，對支付利息者來說，付出的利息通常是一項支出，而對收取利息者而言則為一項收入。由於這些特點，在付息者與收息者之間的利息來源方面，便會予人取巧的機會，而徵收利息稅，正是抑制該等取巧行為的主要途徑之一。

且讓我談談前任財政司一九八四年的演辭。當時他十分關注利息問題可能引起的稅務漏洞，故提出極不受歡迎的業務經營所在地辦法，作為試金石。

難道當年財政司的顧慮全為杞人之憂？

在撤銷稅務條例第 27 條後，所有關乎利息方面的規定均已廢除，餘下的只是針對對銷貸款及一般人為交易等的防止逃稅條文。

我想重申香港會計師公會稅務委員會主席所提出的忠告，就是徵收利息稅是有助於平衡本港稅制的媒介，撤銷第 27 條的規定，將會是本港進入另一個逃稅年代的先聲。

### 其他稅務問題

1. 我對當局把標準稅率削減 0.5% 表示失望。我明白財政司擔心通貨膨脹問題，若進一步降低標準稅率，則可能被人指稱會引起通脹。但我懷疑若以較大幅度寬減標準稅率，個人開支是否



必然會提高，因而導致通脹惡化。當局應否採取若干措施，鼓勵市民儲蓄，例如對參加公積金而需供款的僱員提高免稅限額？

2. 把最初免稅額增加 5%，即提高至 60%，實難以鼓勵廠商在本港投資裝置節省人力的高科技設備。當局何不大刀闊斧，容許廠商在購置有關設備的年度，將整筆投資額在應課稅額內扣除？若能如此，便毋需提供每年免稅額。

3. 創業資金市場人士要求當局就其變賣投資所得的盈利／虧損提出明確的處理稅務辦法，我認為當局應體恤處理他們稅務的要求，因為他們需明確知道如何處理稅務，若非如此，其所從事的業務極不穩定，且極具風險。

4. 我擬探討我們可採取何種措施，以簡化本港的稅制及消除本年度預算案中不公平的稅項建議。

第一、就慈善捐款而訂的 10% 比率應予檢討。倘我們需興建耗資 1 億港元的醫院新翼，而假定某人的應課稅收入亦為 1 億港元，若把該數額撥作完全免稅的慈善捐款，則對政府在稅收上的損失只為 1,500 萬元。為什麼把慈善捐款的限額訂為應課稅收入的 10%，而餘下的 90% 則必須由政府支付？

第二、當局上次是在一九八二年檢討遺產稅的稅級，其後，通貨膨脹不斷上升，故當局目前應調高遺產稅的稅級。此外，側重資產存放地點的辦法亦會大大削減人們把財產存於香港的興趣。當局何不把遺產稅完全撤銷？

第三、倘當局的目標確是實施簡單的稅制，則我主張撤銷薪俸稅中的免稅額遞減率的規定，而非把標準稅率降低 0.5%。實行夫婦分開評稅，肯定會使本港的稅制更形複雜，既然如此，當局何不在現時撤銷該項頗為繁複的遞減率課稅辦法？

### 遷冊事件

對於將控股公司遷往安全基地的熱門話題，社會人士已有不少偉論。香港的公司並無法律上的永久註冊地，何以把這辭彙用於本港，令我感到詫異。

一九九七年及其後歲月引起人們發自內心的恐懼，本局對此不能採取任何辦法直接予以紓緩，但可在兩方面提供協助，以防遷冊事件影響人心。

首先，我們可以研究公司條例中有關一間公司可協助他人收購其股份或使用庫存股本以購入本身股份的問題。法律改革委員會和專業團體已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並原則上表示贊同，故提出有關事項進行立法程序，應較為易辦。

其次，本局可以保證，香港無意讓其立法機關訂立法例，對本港企業或集團確實從外地賺取的利潤徵稅；而根據英皇制誥，亦不能施行此種徵稅辦法。我們也必須把這個訊息傳達起草基本法的人士。

## 環境保護

主席先生，我們一致歡迎你在去年十月本年度會期首次會議席上提交的施政報告，當時你表示，政府當局預算在未來 10 年內動用 100 億港元淨化本港的環境。據我所知，在一份即將發表的白皮書中，這數字將提高至 200 億元。

我曾經查閱預算案，但找不到多少個顯然可列為這方面工作的項目。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財政年度，預算撥予環境保護署的款項為 1 億 8,000 萬元，較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僅高出 20.2%。

即使加上與淨化環境只有極少關連的工作目標在內，如總目 43 之下第 4 項工作目標（設計及建造污水處理系統計劃）等，亦只能得出 5 億 9,240 萬元之數。除了污水處理工程外，我未聞有任何以非經常帳進行的重大淨化環境計劃，而且污水處理系統乃不可或缺的設施，我不認為所需費用會算進該 100 億或 200 億元之內。

我相信以下是一些必須處理的重要問題：

1. 特殊廢物及淤泥的處理及其最終棄置辦法與地點；
2. 包裝物料，例如膠袋、樽及發泡膠午餐盒等廢物的處理；
3. 建築廢物（例如木料等）的處理；
4. 內港水質污染，致海灘不宜進行康樂活動，並危害海洋生物；
5. 強制規定凡有污水渠建造完竣需即時使用。據我所知，現時尚有極完善的污水渠未加以利用；
6. 實施空氣質素管制，使符合標準，如管制來自汽車及煙囪的廢氣等。

驟聽起來，200 億元是極大的數字，但我認為其中大部份需用以提供污水處理設施。即使該筆款項如此鉅大，但可能仍屬偏低的預算，因為僅在六個月前，所訂款額只不過是 100 億元而已。我謹此呼籲，在全港各地興建污水處理設施的計劃，特別是在吐露港等受到危害的地區進行的計劃，應列為甲級工程中最優先處理的項目。

關注本港環境狀況的議員，亦即本局全體議員，均希望當局就如何動用該 200 億元預算撥款作更清楚的交待，並說明何以認為該筆款項足敷應用。本港部份地區的環境正面臨受嚴重破壞的危機，我希望能及時展開挽救措施，免致為時已晚。

## 醫院服務

最後，我必須一提醫院事務署面對的困境，就是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該署所獲撥款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 9%，與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的增幅比較，只高出 3%。

主席先生，一九八八年度的通脹率最少達 7.5%，而我一直認為這數字被低估了；因此，該署的撥款實際上幾乎沒有增加。結果，其負責人勢將不能提供任何改善服務，難怪該署員工需訴諸工業行動了。

我很高興知道，此乃最後一年以這種方式處理本港醫院的財政預算。以鍾士元爵士為首的臨時醫院管理局各成員，包括我本人在內，現正為醫院管理局擬訂計劃，希望該計劃可於本年底前提提交各有關方面研究。我們根據那些相信是醫療及其他服務界最妥善的管理方法，着手制訂多項改變措施；而醫療及其他服務界均需採用科學管理方法，以提供有效的服務。醫院的情況並非獨一無二，我們不可事無大小，全部交由醫生負責，而不理會責任承擔的問題。我深信我們當可制訂一套方案，使本港的醫院管理制度超越南丁格爾的時代，安然穩步邁進二十一世紀。有些改善措施顯然急需進行，但有些則需延至二十一世紀方可完成。這是因應香港的問題，對症下藥的解決辦法。

這項轉變應在明年的醫院財政預算開始時實施。我們必須摒除醫院管理局只是另一個政府部門的觀念。醫院管理局與享有財政自主權的九廣鐵路公司或房屋委員會不同，在未來一段指定的期間內，醫院管理局仍需依賴政府提供龐大的財政資源。其後便須讓醫院管理局在頗大程度上獨立自主，自行決定支付予其屬下員工及外界工作者的薪酬水平，從而提供各項服務。此外，醫院管理局亦必須有能力決定誰人或那個機構最適合提供某等服務，同時亦必須有權釐訂各項服務的收費及提供服務的形式。授權醫院管理局進行上述各事，是為確保有關的資源能獲得善用。

惟有如此，主席先生，醫院管理局方可靈活訂定未來的計劃，順應本港不斷轉變的需求，提供服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許賢發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本港經濟增長迅速，由一九八六年起連續三年每年政府均有巨額盈餘。有鑑於此，我認為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是過份謹慎、極端保守及令人大失所望。至少，它未有將財富公平分配，令所有市民都受惠。

財政司不斷強調通貨膨脹的影響，認為應該從 115 億元「蓄意積累的盈餘」中，撥出 70 億元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過，鑑於本港經濟反覆不定，而通脹速度預料將會放緩，儲存過多款項以應付基本建設的做法是否明智，實在值得商榷。削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無疑會令富人受惠，但結果只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為單親提供的 2 萬元免稅額亦無法惠及在稅網以外一些需要出外工作但入息微薄的父母。現時政府部門需要「定期節食」，以消除積聚的脂肪，但一些需求迫切的社會服務卻未能獲得經費，這實在是一大諷刺。

在本年度的社會福利開支費用中（39 億 8,000 萬元），社會保障金已佔去三分之二，再扣除按通脹而作出的調整額後，可用於擴展現有社會福利服務的經費實已所餘無幾，更不用說提高服務質素了。本港現有的護理安老院及老人服務中心業已滿額；弱能人士家屬訓練計劃急需增

添人手；我們尚需增設 14 間兒童及青年中心；此外，家庭個案、家務助理及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務的議定人手比例，現仍有待實施。我所說的並非一些無關痛癢的開支，而是當社會經濟情況許可時便應提供的基本社會服務撥款。可惜本港雖累積了巨額財政盈餘，但未能推行的社會福利計劃卻不斷積壓。

### 社會政策的轉變

在過去三年，我曾一再促請政府增加撥款以改善社會福利服務的質量，雖然政府已小心翼翼地作出回應，我仍要再次在這裏重申我提出這項懇求的理由。

反對重新分配基本收入的人士根據公平原則提出爭辯，指出一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多於所得到的回報。他們認為社會福利會令人變為懶散，不求上進。然而，社會服務是整套穩定經濟辦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可以減輕失業、疾病或年老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每個社會都有一些不幸人士，而隨着工業及都市的迅速發展，這些人士的數目會日益增加，他們包括來自各階層的青年罪犯、被配偶毆打的人、吸毒者、傷殘者及老人。社會福利可以確保這些人士不會因社會轉變而承擔太大的代價。每個人都有權享受社會福利。因此，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不單只要照顧最沒有能力照料自己者，亦要令到各階層的人士均能自食其力，對社會作出貢獻。

主席先生，這是政府應負起的責任。在道義上，政府有義務，亦有足夠資源去應付社會上不斷轉變的需求。在香港，社會服務的發展全賴政府去推行，因為近 15 餘年以來，本港的慈善服務已不再獲得海外人士的捐助。目前，本港的經濟狀況好轉，財政盈餘數目可觀，大家自然會期望政府慷慨撥款推行社會福利，以滿足市民對改善生活質素的需求。然而，本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署及社會福利補助費方面的開支僅為 13 億元，與去年的 11 億 8,000 萬元比較，增幅甚微，實不足以應付目前社會服務撥款不足的情況，更無法提高過去數年來日漸倒退下降的服務水準。這樣，市民的生活又怎會得到改善呢？

### 獎券基金的撥款

首先，讓我們看看接受社會福利的人士所得到的利益。由於政府需要顧及多方面的開支，故社會福利不能獲得更大筆的撥款，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專為推行社會福利發展計劃而設立的政府獎券基金只得到少量撥款，卻絕不合理。雖然從六合彩收益撥出的款項已由一九八五年的 1.5% 增加至去年的 3.5%，但仍不足以應付載於輪候名單上百多項基本建設及修葺工程的開支，何況一九八八年的投標價格指數已上升 43%。對於此項撥款，當局的解釋是，基本工程所需的經常費用會令政府長期承擔開支。由於當局持這樣的論調，志願機構便陷於不可解救的困境——由於缺乏經常費用，志願機構只有將新計劃擱置，但另一方面，政府卻可聲稱不獲批准的新計劃甚少，因而毋須增加撥款。

目前分配獎券收益的辦法是獎金佔 59%，博彩稅佔 30%，賽馬會的行政費用佔 7.5%，僅餘下 3.5% 撥歸獎券基金。我反對這個分配辦法。我認為賽馬會應在其名下款額中讓出 1.5%，另外政府應將博彩稅所佔比率減至 25%，即回復一九七三年的水平，以便將撥入獎券基金的比率提高至 10%。此外，亦應取消從基金扣除 3% 作為監管費用的規定。有關這方面，我希望本港能夠參考中國所營辦的中央獎券基金的做法。中國所採用的辦法，是在售出 5000 萬張獎券所得收益中，50% 用作獎金，餘下 50% 則撥給各省作福利計劃的經費，而中央政府不會抽取任何行政費用。我謹再重申較早時曾提出的建議，就是 10% 獎券基金撥款其

中一半，應指定用作非經常補助金，另一半則應撥作滾存基金，賺取利息作為改善社會福利服務的經費。

現在應是政府放寬對獎券基金的嚴格管制的時候，以便社會福利經費的問題能夠得到突破性的解決途徑。主席先生，我認為這是合理可行的辦法，可以解決本港目前因資源缺乏而導致社會服務不足的問題。政府應盡快採取行動幫助那些有急切需要的人。

### 反對開徵銷售稅

社會工作界人士關心市民的利益，因而反對本港政府開徵銷售稅的建議。我們認為政府表示因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而須尋求更穩定的收入來源的說法，不過是設法累積資金的藉口。此外，政府打算發掘新的稅源，以擴大課稅範圍，其理由亦難以令人信服。在開徵銷售稅後降低直接稅率，只會令貧富愈趨懸殊。根據劃一比率徵收的銷售稅，會影響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對入息較低的家庭打擊尤大，令到不同入息階層的不平等情況進一步惡化。假如向很多類貨品徵收銷售稅，結果必會令通脹加劇，政府聲稱「銷售稅對本港經濟的干擾甚少」的理論實無法成立。

假如當局堅持開徵銷售稅，我首先會要求當局只向奢侈貨品徵收此稅項，即只限於在批發層面向各類奢侈品，例如珠寶、成人電影、夜總會、賭博及娛樂消費等徵稅，這樣便不會對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產生直接影響。第二，我要求釐訂低的銷售稅率，最多為 3%。第三，必須修訂銷售稅制，規定出口商、小規模零售商及夾心階層市民可獲免稅額或發還稅款。關於這點，當局應訂下豁免課稅的準則，作為日後的指南，這樣便毋須每年進行辯論。第四，政府應增加社會福利開支，提高發給人口多的家庭及單親家庭的公共援助金額，藉以抵銷因開徵銷售稅而帶來的通脹壓力。上述建議的目的，是希望將銷售稅對社會公平和穩定所造成的損害減至最低程度。

下午六時

主席（譯文）：許賢發議員，我恐怕要打斷你的演詞。由於現已屆六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立法局現在應該休會。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本局今天的事務可於今天結束。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主席（譯文）：許賢發議員，請繼續致辭。

許賢發議員（譯文）：提到公平原則，我認為現在應是為長期被忽略的夾心階層提高生活質素的時候。我所指的夾心階層，就是一九八四年人口統計結果顯示的 112000 個月入在 8,000 元至 12,000 元之間的家庭，他們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亦負擔不起私營機構提供的服務。

夾心階層所面對的一個最大難題，就是住宅租金昂貴，通常單是這方面的開支，便已佔去月薪的一半。另外，醫療費用日漸提高，亦令到他們的生活費用增加。而退休的入息全無保障，亦是夾心階層所面對的另一個問題，他們由於入息微薄，故很難有足夠的積蓄去保障晚年的生活。

政府的當前急務，應是為首次買樓自住者提供最高達 50,000 元的首期付款免稅額，作為一種經濟援助。此外，樓宇按揭還款額亦應全部或部份獲得免稅，政府應逐步推行這項措施，以減輕夾心階層的經濟負擔。同時，亦應考慮為這個階層的人士興建更多居屋單位，因為市民若擁有自己的居所，便會對此地更有歸屬感，而這份歸屬感對今日香港至為重要。最近臨時醫院管理局已開始對本港的醫院及衛生服務作出種種改革，這應是考慮設立免稅醫療保險計劃的適當時候，讓本港市民，特別是夾心階層，可以利用中等收費的私家醫院的服務。鑑於私辦公積金計劃在多年後才能為所有私營機構的僱員提供保障，而另一方面，估計到了二〇〇一年，本港的社會保障經費將增加至 80 億元，我謹再籲請當局實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並規定公積金供款可全數免稅，以鼓勵僱主設立公積金計劃。上述政策可以使社會更加平等，令須繳納入息稅但未能取得公平回報的夾心階層受惠。

多年以來，端賴市民勤勞工作，本港經濟得以蓬勃發展。我們不會如一些鄰近國家一般，街上可見到貧民或乞丐，但在本港繁榮幻象的背後，中下階層的市民辛勤苦幹，卻沒有機會分享社會上的財富。創業興家對這些人來說，只是一個神話，因為他們甚至無法給予下一代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主席先生，你在去年十月發表施政報告時，承諾要將香港變成一個「充滿關懷愛心的社會」，要實踐這個目標，政府必須按照實際的社會需要去制訂財政措施。美國總統布殊在就職演辭中曾經這樣說：「我們面對很多問題，但我們擁有更多的愛心，而我們的經濟能力亦負擔得起。」而當時美國正面對龐大的財政赤字。反觀本港，我們又願意為維護社會平等及穩定付出多少代價呢？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王葛鳴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雖然面對多種政治經濟不利因素，本港過往一年仍維持令人欣喜的經濟表現，為政府帶來龐大的盈餘。不錯，目前本港正受著通貨膨脹的威脅，中期來說亦要顧慮九十年代隨時會面臨政治經濟的震盪，須要小心考慮公共開支的增長亦是無可厚非；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不能完全漠視改善市民生活質素這項政府早已承諾的目標和工作，尤其是目前正值政府財政充裕，正所謂「此時不做，更待何時？」可惜，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在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方面，實有不少未令人滿意之處，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是社會福利服務撥款方面。儘管財政司預計政府全年總開支將會增至 700 億元，但獲分配用於直接提高低下階層市民生活質素的社會福利撥款，卻不足 40 億元。從百分比來說，這筆福利撥款只佔總開支的 5.7%，如果和盈餘及總開支數目均有所不及的上年度相比，比率還有所下降。

這筆福利撥款中，三分之二用於社會保障方面；而社會福利署和全港志願機構在提供其他服務所能獲分配的資源不足 14 億元。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已經等待多年尋求改善的社會福利服務，在本年度仍然得不到改進。根據有關方面的資料顯示，這些有需要改善、並已獲得承諾在資源許可下將會進行改善的福利服務有十多項，其中包括老人服務、家庭服務、兒童院服務等等。主席

先生，在財政充裕的今天，實在是著手改善這等服務的理想時機，可惜有關方面偏偏沒有把握這個機會，實在令人失望。

其實，除了服務有待改善外，志願福利機構僱員的福利和待遇一直以來亦是社工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志願福利機構僱員與政府有關僱員向來均肩負著同等的工作，但在福利待遇方面，諸如房屋津貼和醫療津貼等，卻無法與政府僱員看齊。目前我們見到在醫療服務方面，政府已開始照顧到資助醫院員工的福利，何以社會福利界卻仍得不到改善呢？我衷心期望政府能盡快提高志願福利機構僱員的福利待遇，以協助志願機構面對近期日趨嚴重的人才流失現象。

主席先生，談過一般的社會福利服務，我亦希望進一步討論有關青少年的需要問題。在地少人多的香港，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特別需要悉心照顧，倡辦更多的體育活動和營舍服務，一直是關心青少年發展的社會人士所夢寐以求的。可惜，政府長期忽視上述兩方面的工作，先就體育活動來說，目前全港只得一間專門訓練優秀參賽運動員的體育訓練中心；能夠申請到獎學金，可以全身投入體育訓練的青少年只得數百人，這種情況大概可以解釋到何以香港在國際比賽中的成績一直未能進步。撇開精英運動員不談，即使是地區性體育活動的開展，亦往往因著經費不足而遇到阻滯。相信很多社會人士都期望政府能重視體育活動的發展，但可惜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中，我們看不見政府有正面觸及體育活動問題，而在本年度的體育活動發展的撥款，只得 1,143 萬元，數目則與去年相同，沒有半點增加。

我不禁要問，政府對於推動體育活動的誠意究竟有多大？有關方面對於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視程度又有多深？若然有關方面明白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性，亦看見長久以來體育活動的貧乏，何以在財政較充裕的今天，仍不準備就這方面作出適當的改善？

至於營舍服務方面，自去年四月一日起由社會福利署轉交文康市政科管理後，曾訂下一個三年改善營舍員工編制的計劃。本年度是計劃實施的第二年，當初文康市政科曾推算出所需撥款為 2,600 萬元，但結果政府在本年度撥給志願機構用作改善營舍服務的款項只得 1,100 萬元，遠較當初預計為低。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營舍服務和員工編制改善計劃遇到很多困難，我謹此促請政府注視這個問題。

主席先生，第三個我希望談論的問題是稅務安排。在過往幾年間，中下階層市民的稅務負擔一直深受本局及社會人士的關注。我在過往兩個財政預算案辯論中，一直指出本港的薪俸稅制存在著若干不合理的地方，令到中等入息階層需要承擔沉重的稅務，我亦曾多次促請政府容許夫婦分開評稅，以及全面檢討現行薪俸稅制的累進級別。

在今次財政預算案中，我很高興見到財政司建議盡早實施夫婦分開評稅，相信這項消息會受到本港家庭的歡迎。但與此同時，我對於整體薪俸稅制的改革程度仍有未滿意：

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建議就薪俸稅制作出兩項變動；一是將基本個人免稅額增加 3,000 元，使基本及額外合共的個人免稅額由上年度的 36,000 元增至本年度的 39,000 元，另一項變動是將標準稅率由上年度的 15.5%，降低為 15%。就首項變動來說，個人免稅額作出調整當然值得歡迎，但 3,000 元的數額顯然未能追上歷年的累積通脹，普羅市民雖有獲益，但程度不大。至於第二項變動，實際得益者亦只是那些一直繳付最高稅額

的高收入人士，中等入息階層可以享受到的好處並不大，很多中等入息階層仍然需要面對部份收入以高於 15%，甚至達到 25% 邊際稅率計算繳稅。

因此，我認爲現行薪俸稅制仍有進一步改善的需要，使到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謹此再次促請政府全面檢討現行薪俸稅制的累進級別，將累進級別的單位擴闊，令低下階層較不容易跌入稅網。同時，政府應考慮增設自住房屋按揭免稅額，幫助那些希望買樓自住的中等入息家庭，減輕其稅務負擔，從而提高生活水平。

主席先生，最後，我希望藉著今天的辯論，談論一下近期再次引起市民關注的公共事業監管問題。爲著提高經營效益和改進對市民的服務，政府目前將多個不同範圍的公共服務，撥交給一些法定的公營公司負責經營。一直以來，社會人士都關注到這些資本來自市民的法定公營公司，應該如何去受市民的監管和向市民負責。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方式，當然是怎樣去確立這等法定公營公司在憲制上和財政上，向政府部門、行政局以致本局交待的辦法和程序。但一直以來，法定公營公司與政府在憲制和財政關係都存在著值得商榷的地方。

就以近期宣佈將於本年五月同時增加票價的九廣鐵路和地下鐵路兩間公司爲例，在財政方面就擁有高度自治權力，無須受到政府及兩局的監管。根據現行的安排，上述兩間公司均擁有決定票價的權力，雖然程序上，當兩間公司決定增加票價時，仍須將有關資料呈交行政局參閱，但即使行政局不同意兩間公司所作的加價決定，亦可能有需要按加幅撥出相應的款項給予兩間公司，作爲不向市民加價的賠償。由此可見，兩間鐵路公司在財政上是擁有何等自主的權力。

我十分體會社會人士對法定公營公司監管問題的懷疑和憂慮。我亦深悉法定公營公司若沒有足夠的監管，將對普羅市民生活質素帶來重大的影響。因此，我促請政府詳細檢討現行對法定公營公司的監管法規，盡快尋求一個有效的改善方法。

主席先生，總括來說，我認爲在財政充裕的今天，政府應把握機會，著手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畢竟今日令人振奮的經濟表現和社會發展情況，仍是全港每一位市民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理應有權分享箇中的成果。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貝聿嘉議員致辭：主席先生，財政司在本年三月一日發表他任內第三次財政預算案時，語重心長的解釋制訂預算案的任務及要顧及的三大因素，我對此表示歡迎及支持。財政司去年的成就好似魔術師一樣，雖然有十月大風暴，但仍能將估計的 55 億元盈餘變成 142 億盈餘。所不同的魔術師變出來的可能只是幻覺或假的，但財政司這 142 億元已袋袋平安入了庫房。而且不單上年度有盈餘，本年度財政司估計仍會有 115 億盈餘。在此，我盛讚政府公務員的高效率及忠誠服務，財政司在理財技巧方面亦值得稱許。

主席先生，我絕對同意財政司在未來的基礎設施成立基金，並希望這些基金會早日動用，因爲，能夠動用基金，亦即新機場會早日興建，道路、鐵路網、港口，以及排水和污水系統能早日發展。



另一項值得讚賞的，便是財政司順應民意，使已婚職業婦女渴望已久的夫婦分開評稅，終於可以在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開始實施。這個政策對已婚的職業婦女不單帶來一個好消息，而且亦是婦女界不斷爭取男女平等的一個新里程碑。不過在夫婦分開評稅的大原則下，我認爲自由選擇分開或合併評稅權利應屬個別夫婦而不應硬性規定。對於單親家庭，財政司建議增加 2 萬元的新免稅額，雖然作用不大，但仍不失爲一項「德政」。標準稅率減 0.5%，只能說聊勝於無，得益者只佔少數。

主席先生，在有 142 億盈餘下，整個財政預算案給人看來便較爲保守了。因此我有以下幾點意見：

### 夾心階層未受照顧

夾心階層 — 中產階級，在這次財政預算案中，仍是被忽略了。香港的繁榮和安定，夾心階層有一定的貢獻，他們更加是納稅的中堅份子，但福利方面則得益最少。財政司建議個人免稅額由 36,000 元增至 39,000 元，這個增幅實屬偏低。換言之，未婚人士月入 3,250 元以上者，便要納稅，可以預見，更多人士會被納入稅網。在目前通脹率接近二位數時，我認爲個人免稅額應增加至 48,000 元。同時，爲了鼓勵更多已婚婦女再投身入勞工行列，以減少勞工嚴重短缺的情況，在職妻子的免稅額應給予保留。有關子女的免稅額，歷年來都採用累減制，我覺得既不公平亦嫌麻煩。相信大家都同意，在「兩個夠晒數」的宣傳下，目前本港家庭平均子女數目已降至 2.1。所以仍把子女免稅額計到第九個，實在是不切實際亦無意義的，而每個子女的免稅額不同，亦不合理。因此我認爲子女的免稅額應一視同仁，無分彼此。而小孩支出實不比大人少；因此我認爲孩子免稅額應爲大人的一半即 24,000 元，然而，只限兩個小孩獲免稅額。

一直以來香港人都信有安居，才有樂業，因此住屋問題在港人心目中，佔最重要。而夾心階層夫婦的月入剛超過限額，因而無資格申請公屋或居屋。因此豁免自住樓宇的首期供款及每月供樓的利息等的課稅，實在是很合情理的。更可以鼓勵及幫助這群無資格申請公屋或居屋的人士，晉身於「居者有其屋」行列，從而增加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政府對於工業界投資於開辦及購置機器設備亦給予最初免稅額，但對首次購置自住樓宇的人士，則不給予免額，何厚彼而薄此呢？此外，對於僱員在公積金或退休僱員的供款及醫療保險費等亦應豁免徵稅。

### 社會福利撥款不足

財政司在新的一年預算案中，撥給社會福利的開支只有 40 億元，而其中三分之二是用於社會保障及老人津貼，僅餘 13 億 3,000 萬元作爲所有其餘的社會服務開支。

政府在有鉅額盈餘的情況下，仍不擴大社會福利服務，增加社會福利撥款，實在令人失望。尤其是家庭服務方面，全港政府及志願機構，合共只有 3 億 8,000 萬元，表面上似有 9.3% 的增長，但如扣除 8.5% 的通脹，則所增的幅度實微不足道，還沒有計算每年增加的幾萬個新家庭。近年來家庭悲劇屢有發生，記得在去年十一月十日我辯論港督《施政報告》時，亦曾提及家庭服務不足，而本港家庭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和家庭結構的改變及倫理觀念的逐漸瓦解，實有連帶關係。且不少家庭亦正面臨各種程度的危機和問題，因此實有需要增加家庭輔導及家庭

支援服務，尤其是在新市鎮等區，更應加強接觸問題家庭，以便及早發現問題，可以避免問題的發生。

在托兒所及育嬰院不足的情況下，社會福利署積極提倡寄養兒童計劃，實在值得讚賞的。但可惜推行至今，需求日增，但願意參加的家庭卻不多，除了責任問題外，還是否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津貼額太低，因而吸引不到有心人士呢？

香港人口已漸趨老化，目前 65 歲老人已接近 50 萬人，而當局在照顧老人及關心老人方面的服務，實嫌不足。老人院及護理安老院的名額有限，而輪候名單則很長。有時老人在等候期已蒙主寵召了，尤其是當老人須要看醫生時，經常要輪候數小時。政府對學童有保健計劃，為什麼不考慮「老人保健計劃」呢。對缺乏家人照顧的單身老人，當患病及健康衰退時，極易造成意外，希望政府能落實老人外展服務計劃，使單身、年老體弱及被忽略的老人，可以得到社區的支援。目前家庭及社區對護老的支持不夠，因而導致拋棄老人或虐待老人的情形時有所聞，增加社區教育及提高供養父母免稅額可能會有幫助。

許多地方，老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是減費或免費的，因此我建議給予老人免費公共交通服務，讓這批昔日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的耆老，在晚年享受較多福利。

#### 學前教育未受重視

「三歲定八十」是廣東人的口頭禪，意即一個人的好壞決定於他在三歲時，可見三歲在人生旅途中是何等重要。學前教育亦是三歲開始，孩子在幼稚園學習群體生活，學習尊師重道，學習禮貌守法等。學前期有了明確的教育基礎，建立了正確的學習步驟和價值觀，將有助於日後的學習習慣，而這些習慣會伴隨他們成長，直至長大成人。由此可見學前教育有其存在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可惜政府認為學前教育並非必需，因此非但沒有官立幼稚園，連補助幼稚園亦無，形成一般幼稚園教師薪酬微薄，不少經過專業訓練的幼師，在沒有前景下，便紛紛轉行，這樣不但浪費專業訓練資源，且更會直接影響教學質素，如情形再不改善，本港 23 萬名幼稚園學生將面臨上課時沒有足夠的教師照料。

主席先生，學前教育是兒童教育的一部份，政府應儘早落實直接資助非牟利幼稚園教師薪金的政策，以確保廉價而優質的非牟利幼稚園可以繼續開辦。

#### 不應徵收銷售稅

我贊成財政司在草擬財政預算案時，考慮到未雨綢繆的原則。但絕不同意在有 142 億元盈餘時，還提議實施徵收銷售稅的構思。雖然說銷售稅，是在批發層面徵收，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始終是消費者去承擔的。擴大間接稅網，只會令貧富更懸殊，因為銷售稅可說所有人都要負擔，不論個人收入多少，每人都要繳付相同的稅；此舉亦有違香港課稅政策的原則。香港一向以低稅政策享譽國際，每年通過旅遊業賺取巨額款項，如開徵銷售稅，只會損害「購物天堂」的美譽，亦會構成通脹壓力，影響本港自由貿易政策的形象，加上入口原料如需要繳交銷售稅，生產成本勢必上升，亦會削弱港貨在海外市場的經營能力，對整體工業發展帶來難以估計的損失，間接影響香港市民經濟水平。因此，我深切期望財政司擱置徵收銷售稅的計劃。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劉健儀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是他在財政上的另一項精心傑作，顯示出審慎的理財方法。經過連續三年好景，香港累積下來的預算盈餘一年比一年多，直至去年達到 142 億元的新紀錄。在此情況下，有人認為財政司再難有藉口不作大幅度減稅及放鬆公共開支額。但是，一個良好和有責任感的政府必須處事審慎和有遠見，不是只顧目前，而且亦須展望將來。在過去數年，香港的經濟無疑是甚為蓬勃，這有賴香港市民勤奮工作、幹勁十足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寄存厚望將有機會共同享受經濟繁榮的成果，是人之常情。如何制訂一個一方面能符合此等厚望，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對公共財政作審慎管理的折衷計劃，實在令財政司大費思量，增多幾根白髮！謹此祝賀他制訂了一個整體上能孚眾望、為港人接受的收支預算案。

這預算案顯示政府已適當地考慮到市民的現行需要，同時亦沒有忘記須仔細地作長遠規劃的方針。在未來 10 年，香港將着手進行耗資達數十億元的重大基礎建設計劃。香港經歷過一些好景年頭，在我們希望好景常臨的同時，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困境絕不會出現。對香港至為重要的大規模基礎建設及新機場計劃將會在未來 10 年推行。我們必須悉力以赴，務求達成此等工務計劃。倘若一旦發生經濟衰退，使本港的經濟蒙受不利影響或經濟情況不比從前，造成經費不足，以致需要擱置或延期進行這些建設，這些風險都是我們承受不了的。正如財政司在其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指出，本港經濟去年已放緩，增長步伐較為溫和。雖然我們不應過份悲觀，但早已預料的世界經濟衰退已醞釀多時，看來會成為事實的機會甚高，而並非遙遙無期。我認為從政府一般收入項下轉撥款項入各基金，包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及發展貸款基金，以備進行此等工務計劃，是審慎、明智的正確做法；此舉在若干程度上可確保我們具備充裕的經費，進行本港的基礎建設。

我現在想就財政預算案提出幾點意見。

財政司對公共開支採取多項審慎方針，其中對社會福利開支的擬議增幅為 13.8%，實在令許多人頗為失望。把通貨膨脹因素計算在內，這項開支的增幅，以實質計算實在微不足道。主席先生，讓我清楚表明我並非主張香港應成為福利國家。但我堅信一個健全而有效的社會福利制度對維持社會的穩定至為重要，而香港在過渡至一九九七年的重要期間正需要致力於維持安定及繁榮。鉅額財政盈餘為香港持續繁榮的明確指標，我們必須確保社會保障及福利計劃亦得以改善，不會和繁榮脫節。

主席先生，我並非沒有體會到在過往數年，政府已着手增加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但在提供社會服務，特別是佔社會福利開支三份二的社會保障方面，我認為政府應採取較符合實況的做法。僅隨着通貨膨脹將社會福利支出向上調整，是不能接受而甚至是屬於錯誤的，因為用以計算調整的支出水平起點過低，和現實脫節。現舉出公共援助計劃為例，一九八八年四月，公共援助額提高 10%，而今年四月開始再增加 11%。即使獲得這些增幅，除其他項目外，合資格領取公共援助的單身人士最終獲得的款額將為每月 620 元，而有三名成員的家庭，其可領取的最終款額將為每月 1,385 元。倘以百分率觀之，各位會同意這些按年遞增的幅度，並非不合理。但如果以最終所得的數字觀之，援助額的荒謬程度，顯而易見。以現時的生活費用來說，如何能期望一個人能夠以每月 620 元過着適可的生活，此點實在令人莫名其妙。以三名成員的家庭來說，情況更壞，因為這類家庭通常會有年幼子女。三人家庭每月領取 1,385 元，即每人可獲

460 元，此數額大概連支付膳食費用亦不足夠，更遑論其他基本生活必需費用。為何此種情況可以繼續下去，而與同時我們財政盈餘的數額卻顯示我們有能力負擔，不用這樣苛刻。

關於特別需要津貼計劃，我察覺到同樣問題。去年實施的較高額傷殘津貼，及降低領取高齡津貼的適齡年歲當然受人歡迎，同樣受歡迎的就是由今年四月起，各項特別需要津貼額全面提高 11%。但當這津貼額從款額計算，我們將會立即體會到津貼額如何不足及不切實際：一般傷殘人士的津貼為每月 620 元，而需要不斷照顧的嚴重傷殘人士的津貼則為每月 1,240 元。倘我們承認這些人士的傷殘程度差至無能力自我維持生活，或照顧自己，則普通及嚴重傷殘人士的每月津貼額分別為 620 元及 1,240 元顯然不足夠。但我們不應妄下結論，認為所有傷殘者都不能夠工作或照顧自己。許多傷殘人士具有幾乎和健全人士相等的謀生能力；他們許多都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故實際上毋須領取津貼；他們頗有能力照顧自己，但當然亦有許多傷殘人士不能自己謀生或自給自足，而要完全依靠別人。目前領取特別需要津貼計劃的人毋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不論其財政狀況或真正需要，均可領取津貼。這制度對真正有需要領取津貼者實在不公平，因為在隨便發給津貼，而並非只發給真正飢餓者的情況下，真正需要受助者的受益程度必然減少。

年齡達 70 歲及以上人士亦毋須經濟狀況調查而領取高齡津貼。此津貼額經最近提高 11% 後，達每月 350 元，對真正有需要者來說，其不足之處不言而喻。有人稱此項津貼為「生果錢」，大概因為數額太少，以致可能僅夠購買生果而已。我難於了解為何發給這種津貼，這是否向已屆晚年的人致意，抑或確實旨在當高齡人士可能受其家庭的其他成員背棄時，向他們提供金錢上的援助？如果此項津貼旨在後者，為何津貼額少得可憐？

我認為若要提供社會保障，則應實事求是，有效地提供具實效的保障。倘毋須經濟狀況調查而給與社會保障，也許是設法做到面面俱圓，而終於不能取悅任何人。我相信社會保障，必須僅為有需要的人而設，我覺得我們應考慮較嚴格地執行經濟狀況調查，或倘不宜採取此方法，亦應在推行社會保障計劃時，審查其需要程度。

財政司在其預算案演辭內表示，增加開支，表示政府繼續致力提高社會的生活水準，特別是那些十分倚賴公共服務的市民的生活水準。但就社會保障而論，倘我們研究此番說話時，便會發現政府在這方面的改善實在緩慢而且不足。我認為一件事只幹一半，即與未幹無異。倘財政司確實希望提高社會的生活水準，則尚須多費功夫。

至於其他社會福利方面，我須表揚政府，因它已提供一套頗為全面的社會服務，以迎合本港不斷演變和迫切的社會需求。鑑于本港社會日趨先進，涉及家庭的問題也更形複雜，而離婚率與日俱增，隨之而來是顯著增加的單親家長人數，而他們的存在和需要實不容忽視。我謹此讚揚財政司所顯示的體諒和同情，在今年增設單親免稅額。在我看來，提供充裕而有效的家庭服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相信在這個社會架構中，每一個家庭都是不可或缺的成份。我很高興得知政府正着手增添此方面的服務，包括設立更多家庭服務中心、日間託兒所、家務助理隊及家庭個案單位等。我並不認為目前的服務經已足夠，不過，我更覺得有一種服務是缺乏的，就是婚姻輔導。我們不能期望一般的社會工作者能具有充分知識和專業技巧，協助解決面臨破裂的人際關係所難免出現的微妙困境。離婚法庭並不負責使夫妻重修舊好，我十分相信倘我們僱有更具資歷勝任的婚

姻輔導員，在婚姻觸礁初期，及早提供適當意見和引導，本港可能不會出現這麼多破碎家庭。為確保各方面的需要獲得照顧，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定期評估及檢討社會福利計劃的效率及成效。

同時，我也很高興知道，當局已建議提高目前家庭個案的工作人員比率。當處理人際關係時，問題並不在於處理個案數目的多寡，最關鍵的是所提供的服務質素。倘社會工作者所處理的個案數目過多，必然會分散對每宗個案所付出的時間和關心。然而，為使此項建議得以有效地付諸實行，必須聘有足夠的社會工作人員，來應付工作上的需要，況且，目前抱怨人手短缺之聲不絕於耳。政府必須急切解決此問題，著手進行有效計劃，招聘及培訓更多合資格的社會工作者，應付需求。

在其他開支總目項下，很容易便可察覺到凡與越南難民事務有關的部門，所獲得的撥款似乎比其他服務的部門所獲得者為多，例如建議中的懲教署撥款增幅為 37.6%，人民入境事務處則較去年的核准撥款數字增加 33.5%。平心而論，雖然這些增幅並非完全由於滯港的越南難民或船民造成，但我們不期然會想到，假若這些來自越南的朋友沒有給我們這般壓力，我們可將更多金錢用於其他更有需要的工作上。事實上，我們已花了數以億元計的款項在越南難民及船民身上，還要期望我們再耗費多少呢？即使香港有能力負擔，但又為何要永無休止地與這些從未為香港的成就出過一分力，且是不請自來的越南難民分享我們努力得來的繁榮成果？香港深受越南難民問題困擾委實太久，雖然實施甄別政策，問題顯然沒有消滅的跡象，近期的發展更顯示情況可能會每況愈下。我們實不能再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倘若當然遣返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們便應獲准執行。英國是香港的宗主國，亦是一手造成香港陷入如斯困境的政策訂定者，實有責任為香港解決這個問題，而香港政府當局亦須設法說服英國政府不單要履行上述責任，更須盡快進行。

最後，我想論述財政司在演辭中提出有關開徵銷售稅的建議。財政司在剛剛公布本港獲得鉅額預算盈餘後，即重提開徵銷售稅的建議，他的過人膽色實令我驚訝，特別是目前難有理由支持開徵這種稅項。開徵銷售稅的問題必然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在這兩天，不少立法局議員已就這個問題發表言辭激動的言論；在當局發表財政司所提及的諮詢文件進行討論時，相信辯論將會更為激烈。無論建議開徵何種形式的稅項都會帶來怨憤及備受反對，這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目前並無即時可預見有待增加額外稅收的需要。我同意任何形式的銷售稅在本質上可能是倒退的徵稅辦法；我亦同意銷售稅可能會帶來不公平的效果，因為億萬富豪以至入息微薄的升斗市民，同樣受到銷售稅的影響。假若我們有一個更充實、更穩定的稅制，或者根本無須考慮開徵銷售稅。可惜本港的課稅範圍十分狹窄，正因如此，政府的稅收必然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我們已對未來 10 年進行主要的基礎建設以及展開其他建設計劃作出承擔，使香港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安居之所。現正對多項公共服務作出改善，而改善工作必須持續。凡此種種，無財不行，非依賴稅收不可，計劃一旦展開，亦必須繼續下去。正如較早前我已說，我們不能期望好景長在，正因如此，明智的做法是未雨綢繆。我支持擴大課稅範圍的建議，這樣本港的財政制度便不致輕易受到經濟變動的影響。我認為香港應有一個較均衡的稅制，銷售稅的概念有其優點，是應予以考慮的選擇之一。誠然，銷售稅亦有其缺點，但那要視乎當局所建議的開徵辦法而定。因此，除非我們獲悉財政司擬議開徵此稅項的詳情，否則在現時辯論應否接納銷售稅，實言之過早。當局發表諮詢文件後，我們仍有充份時間審議這個問題，在權衡贊成與反對的意見後，我相信屆時定可作出最能符合香港利益的決定。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人龍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財政司衷誠道賀，多謝他向本局提出一個平穩均衡、籌劃審慎的財政預算案。當局對公營部門的財政管理整體上採取審慎策略，我並無異議，但我想談談預算案若干值得從長計議的事項。

### 銷售稅

財政司在其演辭中提及開徵銷售稅的構思，擬以某種形式，在批發層面徵收銷售稅，從而擴大徵稅範圍，並確保政府有一個較為穩定而又不易受經濟波動影響的稅收來源。他亦特別指出在本港開徵銷售稅必須符合的三項準則：第一，銷售稅的稅率必須低，而且能帶來既穩定和數額相當的稅收；第二，對經濟產生最少的干擾；第三，執行容易，成本低廉。我將會逐一探討這三項準則。

我們先研究第一項準則，關於以低稅率取得數額相當的稅收這一點，我想知道財政司是否正在考慮為所有貨物與勞務訂定劃一稅率，以達致這個目標，抑或制訂不同稅率，對奢侈商品徵收較高稅項。這問題至為重要。從一方面來看，就奢侈貨品徵收的銷售稅同樣易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對中下入息人士而言，劃一稅率實難以被視為一項公平的措施。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第二項準則。儘管我並不承認本港經濟會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但開徵銷售稅肯定會為本港稅制帶來基本的改變。這不是一項容許我們嘗試推行以觀後效的措施。一旦要開徵這種稅項，各方面都要相應配合。在作出最後決定前，當局必須審慎衡量商界，特別是旅遊業人士的意見。

有關最後一項準則，以執行成本而言，開徵銷售稅是否物有所值？海外地區的經驗固然對我們的分析有幫助，但我們不要忘記，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是一個較為趨向於以現金交易的社會。數量龐大的現金交易將會令人有機可乘，逃避稅項，因此當局需要進一步嚴密監察。財政司表示現已進行更多研究及正在擬備一份諮詢文件。待獲得詳細的成本效益研究，證明有充份理由開徵銷售稅後，我才會表示意見，希望該份研究文件稍後會提交本局考慮。

至於實施上述稅項的時間，財政司已指出，由於我們目前正受通脹困擾，在這種情況下開徵銷售稅並不適當，這點至為正確。但何時才是適當時機？是否應在經濟衰退，市民入息必然相應減少的時候實施，抑或應在經濟蓬勃，單憑徵收直接稅已可帶來巨額盈餘的時候實施？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從社會及經濟的雙重角度研究這個問題，使納稅人的利益獲得照顧。

### 夾心階層

接着我想談論另一事項。中等入息人士的境況已引起本局持續的關注。夾心階層一詞絕非身份象徵。這個類別人士承受最多稅項負擔，但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最少。以那些每年收入介乎 10 萬元至 50 萬元的人士為例，他們只佔納稅人數目的 37.3%，但所繳納的稅項卻佔該項稅收總額的 61.1%。

財政司在其演辭中承認，本港正面對高通脹率，預期一九八九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上升 8.5%。不過，在其演辭附件 F(3)表(iii)，我們可以看到每年收入在 12 萬元以上的人士，他們

在本年度可節省的稅款僅為 3.2% 至 5.5%。這個情況頗為令人擔憂，因為利率高企、樓宇價格攀升，許多夾心階層家庭用於支付樓宇按揭還款的款項，已佔其收入 50% 或 60%。有一點我們亦不容忽視，就是愈來愈多夾心階層人士正在計劃移居海外。香港前景不明朗固然是影響他們作出決定的最大因素，但我認為應盡量設法挽留他們。雖然我贊同財政司的意見，任何減稅措施均應審慎從事，以免通脹加劇，但我仍促請當局給予夾心階層更慷慨的稅項寬減。

### 政府儲備金

現在我要談及政府儲備金。我同意公共開支必須根據經濟增長而非儲備金的多寡作規劃，而保障開支計劃，使其不會因經濟循環所引致的政府收入變動影響，亦是應該充份顧及的因素，但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採取積極措施向前邁進，並對改善本港生活質素作出承擔。

財政司表示，現在正是著手保留一些款項以應付籌劃中的若干項主要基礎設施工程開支的時候。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但必須強調一點，此舉會令財務委員會較難於監察這些款項日後的運用情況，此外，這些工程計劃的詳情亦應盡早公布。香港現正處於過渡期，政府為未來的投資，肯定會對本港市民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產生積極作用。

香港發展迅速，要制訂長遠的計劃，殊非易事；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及早為日後的需要作好準備，並應因時制宜，隨著環境的改變而修訂原有計劃，這點實屬重要。例如興建新機場的計劃已延宕多時，此外，本港各主要公路的交通擠塞情況日益嚴重，亟待改善，凡此種種，均不容一拖再拖。我確信倘若政府以其一貫的效率辦事，這些重要的工程計劃可望於極短時間內完成。

財政司在其演辭中提及一項新設基金，用於投資在有私營機構參與或由法定機構進行的計劃。我希望當局保證，日後在動用這項基金時，須先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若不然，則必須澄清當局打算如何監察這項基金的運用。由於近年為進行各項不同事務而成立的法定機構數目日漸增多，財務委員會在監察公共開支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已被削弱。相信本局各位同事均會同意這種趨勢是不健全，不應繼續。

### 推廣體育活動

最後，我想對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預算案未有足夠撥款推廣體育活動一點提出意見。我明白，有關成立體育局以負責全面統籌及推行本港的體育政策的建議，已獲當局積極處理。但在此項建議獲得通過付諸實行之前，當局應在過渡期間提供足夠款項，改善體育活動的質和量，以迎合社會人士的普遍期望。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供此項用途的撥款為 1,100 萬元，與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的撥款水平相同。多個體育團體已就缺乏撥款推行活動計劃一事表示強烈關注，我促請政府立刻注意這些團體所關注的問題，訂定可能採取的輔助措施，改善有關情況。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黃宏發議員致辭：主席閣下，現在恰好是下午七時了，但閣下及各位可敬的議員無需恐慌，我不會說得太久，不會長篇大論，又講施政，又講政策，又講策略，又講優先，又講預算，又講制度，（我的演詞為時僅 10 至 15 分鐘）；反之，我還會說一兩個故事或笑話，希望輕鬆一下沉重的辯論氣氛，（可能只是演講，甚至只是讀稿，包括我也如是）。如果因為我的功力不足，講的故事或笑話並非真的好笑，又或對閣下或各位可敬的議員有所衝突冒犯，還望多多包涵原諒。

主席閣下，第一個故事名叫「莊周夢蝶」，我保證故事與主題有關。這個故事出自《莊子》一書的《齊物論》，相傳由名叫莊周的莊子著述。文章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即是說從前有個名叫莊周的人某日在夢中夢見自己化為蝴蝶，栩栩如生，活色生香。文章又說：「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即是說，莊周（亦即蝴蝶）自己覺得很快樂逍遙，忘記自己是莊周本身。文章再說：「俄然覺，蘧蘧然周也。」即是說，不久他突然醒來，嚇了一跳，發覺自己仍然只是莊周。

主席閣下，我這個故事與今次辯論絕對有關，而且是我有感而發的。聽了這兩日各位可敬的議員的 41 篇講辭後（而連同我的還有三篇演辭便可結束這兩日非官員議員的發言了），我覺得我們非官員議員似乎真的或夢或真，化為蝴蝶，化為財政司、律政司、政務司、地政工務司、教育人力統籌司、運輸司等等，甚至布政司和總督閣下，以為發言就可以令到政策大改特改，開支可以大加特加。是夢是真呢？

主席閣下，「莊周夢蝶」的故事，帶引我們進入另一個故事，這是個真實的故事，即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審議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財政預算在三月廿一、廿二、廿三一連三日舉行的特別會議。毫無疑問，過去兩日立法局二讀撥款法案的辯論中，非官員議員是可以談論到改變政策和增加撥款。雖然政府通常不會立即採納而提出修正，或者永不採納，但此舉至少可以收到記錄在案和鞭策政府的功效。但是在財務委員會審議預算的特別會議，議員的法定角色僅是審議政府提出的預算是否超出施行既定政策所必需的款項，所以當時提出或迫使政府增加支出是越權和越軌的。主席閣下，三次特別會議我都有出席，在第三日發言最多，第二日甚少，第一日就差不多完全沒講話，可能由於立法局內務會議分配給我的項目（一般服務）排在第三日會議，所以我可能也不甚勤奮，因為我不甚發言。第二日和第三日，我的提問全部都一字不易、一字不漏地登載在會議紀錄內。但在第一日我送贈出來的一句說話，則不見影蹤。

主席閣下，容許我在此說出來，以求記錄在案。亦容許我引述第二日所說另一句說話來說明「莊周夢蝶」的故事。

各位可敬的議員，視乎各位所坐的是官員席位或是非官員席位，聽了這兩句話，或會會心微笑，或心中有氣，不過一定不會拍案叫絕，亦不會拍案大罵，因為大家都是可敬的議員，而聽我講的是一些連我自己都牽連在內的笑話。

當日出席的議員或者都記得，第一日特別會議有一段時間在某一類服務審議完畢，進入另一類的時候，一批議員離席，而另一批進入會議廳補上。當時，主席布政司霍德爵士開玩笑地說：「你們打車輪戰，不大公道啊！」我說：「主席，你們的隊裏包括了球證啊！」這純粹是笑話（因他當時主持會議），但對於官員可能有啓發作用。



第二日會議進行了大概半小時，我感覺到提問的議員，包括我在內，都似乎在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增加支出。於是，我就說：「主席，我可否建議我們對調一下角色及任務，即改由議員提出支出，而由政府提出削減。」審議工作難道果然是「莊周夢蝶」？

主席閣下，故事到此仍未終結，因為「莊周夢蝶」還有深一層的意義，文章內「俄然覺，蘧蘧然周也」這句話不一定只指睡醒，而是進一步指出蝴蝶在莊周的睡夢中醒悟、覺悟到蝴蝶亦可以是莊周。換句話說，莊周是莊周夢中的蝴蝶的夢中的莊周。我再說一遍，莊周是莊周夢中的蝴蝶的夢中的莊周。因此，文章續說：「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文章再說：「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即是說，莊周與蝴蝶，名份上當然有所分別，但本質上則是一樣的。若果如此，我們應否看化人生？對紛爭看淡些？對人對事應否謙虛些？官員是否必定對而議員是否必定錯呢？轉過來，議員是否必定對而官員又是否必定錯呢？

主席閣下，明白了這深一層的道理：我們對預算、對政策的紛爭就不會被誇大了；對未來政治體制的分歧，亦可以有機會解決了；天安門現時學生與公安人員的對峙，亦不致於升級了。古書果然真是不可不讀啊！

主席閣下，我對財政司提出的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財政預算，大體上贊同，但仍有許多問題不能同意。這些意見，我在以前辯論中，或在財務委員會和其他會議上提過。我會繼續提出，保持對話，但願意接受大多數人的決定。

主席閣下，我在此謹向財政司致敬，並樂於支持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撥款法案二讀的動議。

林偉強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當我明瞭到制訂本年度收支預算案的背景時，我理解到政策與現實之間存在的矛盾。本港政府秉承一貫實事求是的施政作風，在穩定中求進步，已經創下許多良好政績。

財政預算是以符合公共利益或滿足公共需要為目的。市民期望政府將盈餘用以增設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這個要求很合理；而政府亦已表示，制訂收支預算案，旨在嘗試滿足社會的需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在這個觀點上，可以強調說一句，市民與政府之間，理解相同，目標一致，這是一個好現象。今日的辯論，主要在使公共財政管理維持穩健和連貫性，同時帶有鼓勵性的作用。

目前存在三種情況：一、通貨膨脹；二、積累可觀的預算盈餘；三、要着手進行主要基本設施計劃。

這個年度的預算政策、公共服務和主要的社會經濟計劃的管理均由中央政府統籌，當局自然積累了許多行政管理經驗，深切明瞭何者為治本辦法，何者是治標辦法，就事情的緩急輕重，訂定適當的措施。

我所要申述的意見，只是作為一項補充，目的在求公共資源能因應社會的需要，作更公平的分配。

本港連年經濟增長快速，勞工接近全面就業，市民收入增加，按平均人口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約為 9,300 美元。由於市民的消費力增強，通脹壓力亦隨而增加，此乃必然的趨勢。

主席先生，我認為，要應付經濟蓬勃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目前適當的辦法是提高市民應付通脹的能力。積極的一面，是進行主要基本設施，消極的一面，是寬減部份稅項。因此，我要談談興建新機場的計劃。

大家可以認識和理解的情況是去年訪港旅客為 569 萬人，增幅達 25%，構成了交通方面的大壓力。到了一九九六年，即使啓德機場再進行任何擴建工程，也不能應付服務需求。由一九九七至二〇一〇年期間，倘無新機場代替啓德機場，本港貿易、旅遊和其他生意，總共會損失 1,010 億港元。興建新機場時間，預計需要 7 至 12 年，現在正面臨作出決定的時刻。

新機場需要新一代港口設施和兩類型道路系統相配合。目前政府仍在對大嶼山赤鱗角和港島西區兩地點的選址問題猶疑不決。

機場和港口需要相互配合，是選址的最大原則。就港島西區來說，港口的碇泊設施、航道改變、交通配合、環境污染等方面所涉及的問題，都需要花時間加以考慮。大嶼山東北部亦有可供興建港口的地方，配合在赤鱗角興建機場的計劃，比港島西區西博寮海峽會較為理想。

在赤鱗角興建機場，還可以進行一項港口連環設施的計劃，分別在大嶼山東北部、馬灣、交椅洲等地建造大型碼頭。使青衣島、九龍西部和這些大型碼頭之間，連成一個「西部海港」交通網。

本港的機場和港口新設施，需要和中國沿海經濟發展策略相配合，才會收到相輔相成的作用。我認為：部份計劃可邀請私人財團或國際財團共同參與。

主席先生，關於開徵銷售稅問題，其最大動機是政府不想太依賴直接稅，以免因經濟盛衰而對政府收入造成一定的影響。這種未雨綢繆的構想，自有其考慮價值。但從表面去看問題，歐洲經濟增長放緩，保護主義勢力擴張；內地收緊外匯，壓縮進口，到了一九九〇年，本港出口可能下降，導致公司利潤減少，影響直接稅收入。政府推斷情況轉變下，及早研究和擬定應變辦法，是其責任上的需要。但從深入的層面去看問題，本港貿易已經多元化，亞洲方面，中國雖然壓縮進口，但日本仍然採開放政策。本港產品最大市場的美國，經過去年進口率下跌 2% 後，今年可能有回升形勢。綜觀南美、東歐、蘇聯、中東等地區的市場，多呈現逐步開放的狀態，前景令人興奮。樂觀人士的看法，今年的出口增長率，可能達到 8%。

銷售稅雖然擬在批發層面徵收，但也要增加不少人手和行政費用。目前本港已出現公營部門膨脹現象。自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開始，公務員編制的增加率，一直超出預算準則的 2.5%。過去兩年為 3.3%，今年可能增至 3.9%。將來開徵銷售稅，更會使公營部門進一步膨脹。

傳統的徵稅原則，以拔鵝毛作比喻，「拔毛要多，叫聲要小！」開徵銷售稅，不論採用什麼方式，都會增加廣大市民的負擔，同時亦增加了通脹的壓力。稅制由簡單而變為複雜，影響香港成為「購物天堂」的美譽，旅遊業亦可能受到影響及打擊。當公營部門膨脹之後，再來檢討開徵銷售稅的得失，可能會發覺：「鵝毛拔得不多，鵝聲卻叫得很大！」

主席先生，我覺得本港經濟雖有放緩趨勢，但無衰退危機。在本財政年度內，無須過份憂慮直接稅的收入，當然亦不適宜作出開徵銷售稅的決定。

關於遺產稅方面，自一九八二年訂立最低限額為 200 萬元以來，至今已有七年，未有作過調整。根據七年前後的物價差距，我建議將遺產稅的最低限額，提升到 500 萬元，以示公平。

概括來說，我對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辯論，主張立即作出興建新機場的決定。我對政府撥出 70 億元作為「轉撥發展貸款基金」，備供將來機場、海港、鐵路、公路等建設之用，深表贊同；我對開徵銷售稅則不表支持；而提升遺產稅的最低限額，則是我有見於社會實際情況而向當局發出的呼籲。

財政預算關係社會整體的成本利益，需要作全面觀察和全盤規劃，訂出最大利益的決策，包括無形的利益和間接的利益。對於即將發表的鄉村新發展策略，我希望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內，能夠受到當局的重視，現在正是正式開始徵詢意見的時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鍾沛林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當我知道自己是在兩天財政辯論中最後的發言者，便擔心是否只剩下主席和我二位，在會場，現在覺得很高興，因為會議廳仍有很多精神奕奕的同事，他們似乎還可以進行幾個小時的會議。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度財政預算案，是一個既要減稅、又能提供更多服務、而仍可獲得大量進賬的「盈餘預算」。我同許多香港人一樣，對新預算深表歡迎。

財政司翟克誠先生說明，下年度歲入為 811 億 7,500 萬元，歲出包括 177 億元的基金撥款在內共為 690 億 6,500 萬元。預期將比對盈餘 120 億元入賬後，本港的累積儲備就會增至 700 億元。

新預算顯示，政府不但對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充滿信心，而且有把握使本港的財政儲備保持在一個安全的高水平之上。有錢好辦事，各項服務的發展自然順利，所需大建設的集資計劃亦可以水到渠成。

我最欣賞財政司為多項計劃中的本港重大基建工程預留款項，尤其是要適當增強「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預算決定，現在開始從政府收入中增撥 70 億元投入基金，並預期直至一九九二年，這個基金將會增達 163 億元。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安排，表示政府準備興建新機場、港口及道路網等基礎設施的計劃，如無意外，事在必行。值得特別強調的是：

第一、這個基金，應可視為香港能在「過渡時期」繼續保持安定繁榮及不斷進步的標誌。

第二、積穀防飢，基金無論在經濟順境或一時逆境的情況下都可為各項基建工程的正常進行及長遠發展提供所需的財政支持。

第三、龐大基金及投入新機場的建設，足以增強大眾及其他投資者對香港前途自由發展的信心。

我希望政府儘快公佈興建新機場的具體計劃，並提早施工。

事實上，新的盈餘預算、基金計劃、及整個的財政策略，本身依靠的經濟基礎是相當強勁的。雖然，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香港經濟的發展或會同世界潮流一樣略為放緩，但本港生產總值預測仍有 14.3% 的增長，減除通脹率，實質增長約為 5%。政府統計，目前本港的失業率低至 1.3%；今年香港人平均收入為 85,000 元，較去年的 75,000 元約增加 13.3%。全面就業，入息增加，當然反映了工商百業及個人生活都普遍向好，同時亦為政府的財政政策提供了豐富的稅源及其它可資運用的資源。

我相信，每一位勤力工作的香港人都應能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成果；但要注意，現時本港的通脹率及加薪水平可能比財政司建議個人入息免稅額的新增數字為高。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報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份的整體表面工資指數為 166.6，較一九八七年同期上升了 10.2%；期內個人服務的工資指數升幅最大達到 21.9%，商業服務工資則升至 19%。如果這可作為新增免稅額的計算基礎，則免稅額祇提高了 8% 左右，結果會使更多低收入的市民陷入稅網。例如去年本港納稅人約有 70 萬人，預計今年就會增至 79 萬人。其中會有幾多人的新增入息要被稅額吃掉呢？這應否在有合理需要時對入息免稅額的寬減程度提出檢討？

財政司憂慮本港的通貨膨脹會中期加劇。但我覺得這個問題與合理提高個人免稅額的關係很小。因為物價和工資的上升水平，高於目前所擬的免稅額增加程度。

預算提到本港現時勞工短缺的問題，看來政府正有意放寬輸入技術勞工；而從中國內地引進工人，可能亦在考慮之列。

本來，我不認為輸入勞工的現行限制應有所改變。整體來說，我相信大家應特別重視本港勞資關係中「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傳統精神。任何僱員或僱主均應共同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有困難時就要同舟共濟。而即使是勞工不足，大抵祇是一時現象。若放寬或大量輸入外地勞工，則在我們的「自由市場」中誰能保證本地員工不受「惡性競爭」所影響？

土地、資金、人力，是經濟結構中的三元素，缺一不可。現在的問題是：本港不祇工商界的主要行業出現工荒，甚至政府及公共機構若干部門亦出現大量空缺。九大商團的聯合工作小組指出，本港現時勞工短缺達 24 萬名。另據香港政府估計，一九八八年香港人向外移民達 45000 人，其中 25% 為經理及技術專業人士；直到目前，人才外流的趨勢仍未扭轉。我覺得，在全面就業的情況下，如果工荒的問題加劇演變下去，本港經濟的發展將會受到嚴重損害，結果對本地員工及僱主都沒有好處。

面對現時局面，如果政府要放寬輸入技術勞工，或包括引進大陸工人，我感到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但應強調：輸入勞工祇應是一個因時濟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的臨時性行政措施。

具體來說，政府應明確規定：僱主不得以廉價輸入勞工，致損及本地員工的地位和利益。任何入口勞工的工資、福利、房屋及旅費的總額，應不低於本地同類職級員工的待遇。

我認爲，基於本港良好的、穩定發展的勞資關係，並通過有關商團與工團的合作和諒解，以一定條件輸入有限度的勞工和專才，爲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工荒支援提供彈性的配合辦法，這樣做應符合本港社會整體最佳的利益。

大家知道，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是互爲因果的。香港在這過渡時期，社會安定更成爲經濟繁榮的先決條件。因此，加強本港保安設施及所需撥款，就應在財政預算中被列爲資源分配的重要一部份。

財政司在新預算中撥出 102 億元作爲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的保安開支，佔政府總歲出的 15%，較去年增加接近 30 億元；主要由於需要準備逐步接替駐港英軍的工作，在保安計劃中就打算於今年內繼續增編警察 2000 人，我認爲這真是一個切合民望的英明決策。

從本港現時的社会結構說來，社會治安應建基於一個健全的多層大廈管理制度，以良好的大廈管理爲基礎，積極發展高效能的警民關係及適當合作；現正在全港各區大廈擴展中的、由警務處及中央滅罪委員會主導的「鄰里守望計劃」，就是一個有效地減少大廈盜竊案的好計劃。

總督委任組成的私人大廈管理諮詢委員會，現正展開工作。我們希望訂出一套完善的法律架構，幫助業主依法管理好自己的大廈。從基本上說，我們要通過諮詢及立法程序，制定大廈公共契約的公平條款，隨而以簡化模式全面建立各大廈具有本身管理的權力。

目前，大廈管理的新制度可望指日建立起來。我們的目標，不但要從大廈管理設法加強基層治安，同時要改善居住環境及提高生活質素。但在有關整個工作的發展進程上，應該要有政府的適當資助和人力支持。

我認爲，政府除了提供大廈管理諮詢委員會所需的人才和行政費外，應同時打算對地區性的大廈管理統籌委員會、政務總署及各分處、大廈管理統籌隊等負責機構給予一個綜合性的專項撥款。

有關改善大廈管理的設施、應辦事務、編製文件、資料搜集、調查研究、宣傳教育、開研討會、接受投訴及進行協調等一系列工作的策劃、統籌及分工，顯然都要有足夠的資源支持。

一直以來，區議會及政務處對有關私人大廈的管理活動都有資助，近期開支：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共約 23 萬元，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增至 316,000 元。這雖然微不足道，但正可說明一個事實，財政預算若反映政府政策的取向，現在展開中的大廈管理新政策就理應取得所需的財政支援。

在保安環節中，許多人關心到香港作爲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的問題。外地不時有非法移民逃入本港，而政府對這種偷渡者一律施行「即捕即解」的政策，惟獨對來自越南的「難民」或「船民」，本港政府卻先予收容，後加甄別，按個別情況，予以遣返。

我認爲，應透過英國請求聯合國協助令到越南政府盡量阻止其國民非法逃來香港及各會員國要在一個預定期內分批及最後全部收容所有滯留香港的越南難民。直到目前，我們仍無收到足夠證據支持越南政府已盡所能制止其國民逃離。如越南船民仍不斷湧來，情況惡化下去，就應積極考慮撤消「第一收容港」政策。

主席先生，我贊成通過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財政預算案，並希望政府特別注意在過渡時期加強本港的保安措施，為大廈居民及整個社會的安居樂業提供所需的財政支持。

主席先生，我謹此支持動議。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我謹動議押後辯論此項動議。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 休會與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本局議員忍耐了 10 小時，不論他們是在扮演莊子，抑或蝴蝶，殊堪讚賞。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七時三十一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所列條例草案簡稱的中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效力。）